

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

Anarchists Vanzetti and Sacco

[美]万塞蒂、沙珂著

巴金 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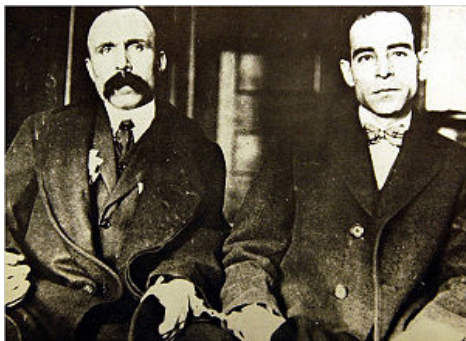


安那祺主义文库 A-1

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

Bartolomeo Vanzetti and Ferdinando Nicola Sacco

[美] 万塞蒂、沙珂 著
巴金 译著



安那祺主义文库 A-1



中日美 比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16001-3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oville,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160 Maidenhair Ct., San Ramon, CA 94582 USA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中文

Editor 编辑: Jing Zhao 赵京, jzhao@mail.h-net.msu.edu

Edition 版本: First Edition 第一版

Version 印次: 1st Printing 第1次

Date 日期: November 11, 2009 2009年11月11日

安那祺主义文库 编辑出版发行 序言

自从 1989 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从日文和英文读到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1992-95 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绮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当我得到巴金的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 10 卷电子版）时，读到巴金早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黑色战线”史料，欣喜若狂，这里还有许多是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可悲的是，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无一例外被加上无知、愚昧或无耻的政治按语。更不用说，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 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书；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

本文库收集的史料，多数来自网上。无论是已经去世的著者、译者和我（编者加少数文章的作者），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所有权”，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

文库大致按国度和时间次序分类。A-美国、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和“安那其主义”通用。目前收集到以下史料入文库：

A-1: 《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万塞蒂与沙珂著，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

A-2: 《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2-9

C-1: 《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ISBN: 978-0-557-19209-0

- F-1: 《什么是所有权》，蒲鲁东著，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 R-1: 《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6157-7
- R-2: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3-6
- R-3: 《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6-0
- R-4: 《俄罗斯革命的起源》，斯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7-7
- R-5: 《一个革命者的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 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5-0
- R-6: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巴枯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R-7: 《革命的先驱》，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2345-9
- S-1: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收入巴金六篇译文、赵京三篇文章，ISBN: 978-0-557-17055-5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09年11月11日

《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编者 序

对万塞蒂与沙珂的审判是美国的司法史和安那祺主义运动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他们被处死半个世纪后，1977年8月23日，时任麻省州长的民主党人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签署宣言：“任何耻辱必须永远从沙珂与万塞蒂的名字除去。。。今天，我们说：我们在麻省引以为自豪的高度司法公正，对不起沙珂与万塞蒂。”“Any stigma and disgrace should be forever removed from the names of 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We are here to say that the high standards of justice, which we in Massachusetts take such pride in, failed Sacco and Vanzetti.”在麻省的州政府大厅，还设置了万塞蒂与沙珂的塑像。这并没有增添万塞蒂与沙珂的光芒，而杜卡基斯倒得到以后竞选美国总统的资本。



当然，与芝加哥Haymarket六位无辜的安那祺主义者的殉难一样，沙珂与万塞蒂的生命唤起的全美国、全世界的抗议教育了包括巴金在内的整整一代人，阻止了美国司法进一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滥杀无辜的安那祺主义以及其他的下层民众的反抗，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事业。

这使我们不由得对比20年前被镇压、出卖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国的民众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经历了这样持久的抗争之后，一定会迎来自由、民主、人权保障的前途。

赵京

目录

前记

万塞蒂著[一个无产者的生活] 小引、代序、我的幼年、希望之国、工作！工作！工作、我的精神生活与信仰

译文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1928年上海自由书店初版时题为《一个卖鱼者的生涯》，193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题为《我的生活故事》，1939年上海平明书店一版时题为《一个无产者的故事》。

[我的眼泪]

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金全集》第9卷，来自1951年出版的《巴金选集》。我们无法考据作者1931年原作，但是，（通过此文也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巴金1931年的原作至少不可能把主人公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受难原因（安那祺主义信仰）掩盖起来。此处没有把“鱼贩子”改为万塞蒂，“鞋匠”改为沙珂，没有把“美洲”改为“美国”，没有指明他们为之殉难的安那祺主义者身份，最终需要以1931年版才能修订。

[电椅]

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金全集》第9卷。

“死囚牢中的六年”、“沙珂与万塞蒂之死”、“死者与生者”、“殉道者的遗书”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

“法律下的大谋杀”两文、“沙珂与万塞蒂是无罪的人”、“寄《革命周报》编者的信”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金全集》第18卷。

前 记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夜在美国麻沙秋谢州，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内有两个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电椅上。这两个人是鱼贩子巴尔托罗美·凡宰地和鞋匠尼可拉·沙珂，关于这两个人我在文章里不知道提过多少次，我还为他们写了两篇小说《电椅》和《我的眼泪》。现在八年过去了，又到了那个使人痛心的纪念日，但已经是第八次的纪念日了。我想写点文章纪念我在《灭亡·序》里提到的“我的先生”，可是我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来表示我的悲愤。不知道是不是这八年的经历使我的神经麻木了？结果我只译了这篇“自传”。这是第二次的翻译。在一九二七年我还草率地译过一次。这篇短文比我所写的一切纪念文章都有力，它本身是很朴质而又很雄辩的。谁能相信这是一个鱼贩子笔下写出的东西呢？

关于那个鞋匠，我现在把他写给他的儿女的告别信译出附在这后面，这两封信还是我七年前的译稿。

以上的话是一九三五年写的。现在是一九三八年了。我还不能够将我计划中的那本关于“沙凡事件”的书写成。在今年的纪念日我依然没有一件像样的祭品献给那位我所敬爱的

巴金译文全集·我的生活故事

先生。我抱着深的悔恨和怀念，把这本小小的自传印出来。
这是一本真实的书。它会感动许多纯洁的心灵的。

巴 金 一九三八年七月

小 引

尼可拉·沙珂和巴尔托罗美·凡宰地的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然而我们美国人中间除了那些和这案子有直接关系的人以外,就很少有人熟悉这两个人的人品,虽然他们的命运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国际的关心。

我有特权和凡宰地本人认识,而且被他的诚实和朴素所感动了。那般注意过这个案子的审判的人都相信着他的无辜,等到他们和他相识以后,这个信仰就变成更坚强了。虽然他已在死刑的威胁下过了三年以上的光阴,他依旧保持着心境的平衡,对世界大事仍还热切地关心,他的求知欲也并未消减。每个住在麻沙秋谢州的查尔斯顿监狱里的囚犯必须每天做八小时左右可以做完的包工;但是凡宰地因为格外勤苦,不到八小时就可以把工作做完,利用剩余的空暇来研读英文典籍。

凡宰地的自传印成小书,这是第一次。这是一份卓越的人事记录。请读者公平地读这小书,来判断它是否指出一种罪犯型的性格。

阿丽思·斯东·布拉克尔威 一九二四年八月

代 序

读者在沙若(Henry D. Thoreau)的传记里会见到一段轶事:当[美国]某州的州政府逮捕逃走的黑奴,把他们交还给原主时,沙若便拒绝纳税。

他因此被捕,囚在狱中,有一天爱默生(R. Waldo Emerson)问他道:“亨利,你在这里干什么?”沙若的回答是:“华多,你不在这里又在干什么?”

恰与这段故事相合,约在一年前我去拜访那个世界最优美的精神之一人,他现在被囚禁在麻沙秋谢州的查尔斯顿监狱里面。他并不因为我不同他一起坐监,就责备我,然而他的精神的美丽和仁爱却使我觉得非常惭愧,不久我竟然也想去坐牢了。殉道的精神就这样地传播了。

这个麻沙秋谢州的伟大人物是谁呢?在我的面前放着他的自传,这是刚出版的,书名是 *The Story of a Proletarian Life*, 著者是巴尔托罗美·凡宰地。

从这部书我知道他生在意大利的皮德梦特区的非拉法勒托城。他是一个农家子,自小便热心求学,也受过一点教育;然而当他的父亲在一家报纸上看到吐林有四十个律师去竞争一个每月只有七元美金的位置时,他便断定教育并不像一

代 序

般人所说的那样有用。

因此在十三岁时,这个小孩便被送到一个面包店主人那里做学徒,那个主人要他每天从早晨七点钟做工到晚上十点钟,七天一个星期,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天才有三点钟的休息时间。

六年以后这个孩子回到家里身体已经坏了。他守着他的母亲痛苦地病死以后,他便决定到我们的希望之国来。他上岸后一个朋友也没有。后来他才在一家“阔绰的俱乐部”里得到洗碗碟的工作。这个俱乐部显然不是很阔绰,不能够(?)让那班洗碗碟的人受到较合于人道的待遇,因为工作时间很长,睡眠的地方又闷热,而且还有蚤虱咬得人不能闭眼。

所以凡宰地又到另一个地方,到一家纽约最有名的时髦的饭店去工作。自然你们常常到这个饭店去进餐,也许还是和几位名人一起去的。倘使是这样的话,你们一定忙着去和名人周旋去了,绝对不会想到那些洗碗碟的人。请听他说:

“它的厨房的确是很可怕的。在那里面一扇窗户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倘使电灯一旦熄灭,房里就是完全黑暗,人一举一动非和器具相撞不可。在洗涤碟子、锅、刀、叉、调羹等等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混杂着灰和污物,慢慢地落下来,我在下面作工,它们便一点一滴地打在我的头上。工作的时间中厨房里热得真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余都倾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边,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污水槽又不能直接通到沟渠。污水常常满溢而反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在厨房中央有一根排水管,每晚那

管子总会给闭塞住，油水愈积愈高，于是我们只得在油腻的水里走来走去了。”

这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恐怕患肺病，不敢再在那家饭店里作工，便到乡下去。农人和贫家妇人待他都很和善，他找到制砖和石矿中的工作。后来不能够做下去了，他又去做厨子，以后又做拿锄锹的工人。最后他成了一个游行的卖鱼者，往来于麻沙谢州各小城。

他入狱以前还做过敲冰、给电灯厂铲煤、挖沟等等工作；落雪后他又去扫雪，后来又做挖沟安放水管的工人；以后又捕蛤，于是他就被捕了。

这便是这个人的外部的生活。这和其他的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你看，这就是“穷人的简短的编年史”。然而一个人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肉体和精神；穷人的精神常常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有印刷所了，连那些在面包店和饭店中每天作工十三小时或十五小时的人，也会找到几分钟的空闲来思索，来阅读各时代的名作。

我希望我能够给你们开一张凡幸地读过的著作的名单。你们一定会奇怪的。倘使你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商人，这也许会使你吃惊，因为这些都是古怪的外国名字：德·亚米契斯和圣奥古斯丁、但丁和克鲁泡特金、高尔基和拉布里阿拉、列朗和雨果。

现在他把他的生活的故事写出来了，我仔细地把它研究了以后，我真愿意到法庭上去以一个社会理想主义的专家的

代 序

资格作证,证明与其说凡宰地犯了抢劫杀人罪,还不如说是我自己犯了那个罪更像些。

然而,唉,这种专家的证据是不会被美国法庭承认的!因此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尽力把凡宰地的自传介绍给你们了。

阿普顿·辛克莱 一九二三年

我的幼年

我的一生不配被写一部自传来叙述。我只是无名的群众中间的一个无名者，而且在那把人类引到较好的前途的思想或理想中，我也不过见到一线微光罢了。

我在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一日生于皮德梦特枯内奥非拉法勒托城。父亲的名字是巴提司他，母亲的名字是焦凡娜。这小城立在麦格拉河的右岸上，被一带美丽的小山环抱着，原来是一个农业区域。在这明媚多阳光的地方我依恋在双亲的膝下，一直住到十三岁。

我在本地小学里上课，我那时很用功。我的最早的记忆还是在学校考试时候得到的奖品，还有宗教问答的第二奖。父亲当时心里很是踌躇，究竟叫我继续求学呢，还是让我去做学徒，习一门手艺。有一天他在《民报》上见到一则消息，说在吐林有四十二个律师报名去竞争一个月薪三十五个利尔的位置。这个消息便决定了我的少年时代的命运。因为它使我父亲决意叫我去学习一种职业，将来好做一个店主。

因此在一九〇一年父亲便把我送到枯内奥城柯林诺先生的点心店那里，让我第一次尝尝辛苦无休息的劳动的滋味。我在那里作了差不多二十个月的工，每天从早晨七点，到晚上

我的幼年

十点都是我的工作时间，每月只有两次三小时的休息。我离开枯内奥就到喀富尔，在瓜特尔先生的面包店里做工，在那里一共住了三年。情形并不比在枯内奥时好一点，不过半月一次的休息时间是五个钟头。

我并不喜欢这种职业，不过为了使父亲高兴起见，我便将就地过活下去，而且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别的什么职业好。一九〇五年我又离开喀富尔到吐林，希望在那个大大城里找到一件工作。到了吐林我才明白我的希望只是一个梦，便只得再往前走，到古尔尼去。在那里我作了六个月的工，于是重回到吐林找着一件制糖果的工作。

一九〇七年二月我在吐林患了重病。我身体变得很坏，非常痛苦，终日关在房里，像“一朵悲惨的日荫花”那样，我享受不到一点空气、太阳和欢乐。然而我的这情形给家里知道了，父亲便从非拉法勒托赶来，带我回故乡去。他告诉我，我回到家里会有我母亲来看护我，我的母亲，我的贤良的母亲，我一生所最爱的母亲。

看不见一眼所谓上帝的光荣的世界，呼吸不到一点自由的空气，在面包店和酒馆厨房的恶臭的环境里作了六年的苦工以后，我便这样地回家来了。本来这六年的时间对于那般热心向学、渴慕故乡的朴素的田园生活的青年，是一个何等美丽的时节。从小孩长成为大人的奇妙关头便是在这些年代。呵，可惜我不曾有闲暇来观察这种奇异的发展。

火车里的三小时的光阴只有那些患过胸膜炎的人才可以想象到。然而甚至在痛楚的时候，我也还能够望见我们所经

过的美丽的广大的田野。意大利北部的深绿的山谷，便是严寒的冬季也不能够叫它们褪色。这种美丽的景色至今还活泼地存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母亲慈爱地接待我，她悲喜交集地抱着我哭。她把我放在床上——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世间还有一双手能够如此慈爱地爱抚我。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以后有两个多月我只能够扶着一根粗重的手杖走路。最后我的健康完全恢复了。从那时起一直到我去美国的时候，我都是住在父亲的家里。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我是二十岁的人了。这二十岁从来是希望与幻梦的魔力最大的时期，甚至对于那般和我一样早熟地翻阅了“生活之书”的人也是如此。我认识了许多朋友，而且把我心里所含有的爱尽量地倾吐出来。在家里我还帮忙父亲经营菜园，我那时的热心，是我在城里从不曾感觉到的。

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不久就被一件灾祸来扰乱了。灾祸之来，本是人生所难免的，但是人们所能遇着的最悲惨的灾祸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

在一个悲惨的日子里我的母亲病了。她，我家庭和我，我们所受的苦楚是笔墨所不能形容出来的。偶尔一点微小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傍晚的时候常常有成群结队的青年沿着大路快乐地歌颂那初见的星群，自远而近，走过我的家门，我连忙跑出去，请求他们为了爱上帝和爱他们自己的母亲的缘故，不要作声。这样的事不知有多少次了。更有许多次我跑出去哀求那些过路的人另走别一条路，不要经过我家

我的幼年

门前,恐怕他们的谈话惊动了我的母亲。在她的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痛苦是如此地可怕,便是我的父亲、她的亲戚和她的最亲密的朋友都不敢走近她的床边。我一个人守着她,尽力去安慰她。我不分昼夜地守在她的身边,看着她的那种苦楚,我也无异乎在受惨刑。整整有两个月我不曾脱去衣服,安静地睡过一刻。

科学没有用,爱也是无用的,经过了三个月可怕的重病以后,我的母亲终于在我的怀抱里死去了。她死去了,听不见我的哭声。我亲手把她放进棺材;我伴着她直到她最后的安息地;我掷了最初的一把泥土在她的棺上。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那时所留下的空虚从来不曾被填补过。

然而这打击太厉害了。时间非但不能宽慰我的悲哀,反而使我的痛苦一天一天地更加厉害起来。我看见父亲在短时间里就白了头发。我自己也变得更孤独,更沉静,有时候我整天都不开口,就在麦格拉河畔树林里徘徊。有许多次我走过石桥,便在桥上伫立了许久,呆呆地望着下面砂上的白石子,把这当作美妙的睡榻,以为在那上面是不会再有梦魇了。

这种绝望的心境使我决定离开意大利到美洲去。一九〇八年六月九日我便和我的亲爱的人告了别。在别离的时候我的悲哀是这么大,我吻着我的亲友们,把他们紧紧抱着,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在他的深的悲哀中也说不出一句话。妹妹们伤心地哭着,像她们从前哭母亲那样。我的远行引起了村里的人的注意,邻居们都跑到我家来,把屋子挤满了,每

一个人都送了我一句希望的话，一点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结队地跟着我走了很远的路，好像有一个村民被判了终身流放罪，现在永离他的故乡了。

临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在动身前的几点钟我去和一位老妇人告别，她自从我死了母亲以后就待我如同她自己的儿子一样。我看见她站在门口，和她的年轻的媳妇在一起。

“呵，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她说，“去罢。愿上帝的爱跟着你。我从来不曾看见一个儿子对于母亲做过像你所做的那些事；孩子，愿你有福。”

我们接吻着。于是那年轻的儿媳也说话了。

“也和我接吻罢。我很喜欢你，你是这样地好，”她说着，一面吞她的眼泪。

我吻过了她便连忙逃走了，我听见她们在我的后面哭泣。

两天以后我离开了吐林，到边境上的摩德拿城去。当火车载着我向着国境飞驶的时候，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流下了几滴泪珠。我便这样地离开了故乡，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漂泊者！那些单纯的灵魂，那些高贵的心灵的祝福就这样地开花了。

希望之国

乘了两天的火车,到了法国,再在海上过了七天,我终于到达希望之国了。纽约城高耸在天际。它的伟大,它的幸福的幻景全部现在我的眼前。我站在三等搭客的甲板上,张大我的双眼,想把眼光穿过那一大群站在岸上的码头工人,看看岸上的景物。船一靠岸,那一群工人便立刻招呼并且威吓那些拥挤在三等舱里的男女搭客。

在移民局里我遇着第一次的惊骇。我看见那些下等舱搭客被官吏们当作畜生一般地待遇。没有人拿一句良善的话、一句鼓励的话来减轻那些初到美国来的人心中的恐怖的重压。希望,它曾把这些移民引诱到这个新土地来,如今它又在粗暴凶恶的官吏的接触下逐渐地消失了。还有那些小孩子,他们本应该是充满着希望而快乐跳跃的,现在却拉住他们的母亲的衣服惊惧地哭了起来。这种残酷无情的空气充满了整个的移民局。

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人站在炮台前面,带着几件旧衣服和很少的钱。前一天我还是生活在能够了解我懂得我的语言的人群中间。这天早晨我却似乎醒在一个奇异的国土上面了。在这里的居民听起来,我的语言好像一个不通人话的畜

生的可怜的叫号。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应该做什么？这里便是我梦想了多年的希望的国土。高架电车吵闹地跑了过去，并不给我一个回答。汽车、电车也急驶过去，并不注意我。

我以前记下了一个地址，一个同船的搭客把我带到那里去。这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家庭，在第七号路附近的某街。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时候，然而我很容易看出来那里没有地方给我住。因为那里和所有其他的工人家庭一样，是挤满了人的，晚上八点钟我便怀着深的忧郁离开那里，到别处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我又走向炮台，在一个下等的客栈里睡了一夜，这在我已经算很好的了。过了三天，我那个同乡给我找到了一件工作。他在赫贞江畔的西某街的一个阔气的俱乐部里做厨师的头脑，便叫我在他的厨房里做洗碗碟的事情。我在那里作了三个月的工，工作时间很长；我们在里面睡觉的那间阁楼又是十分闷热；蚤虱咬得我整夜不能够闭眼。差不多每夜我都要逃到公园里去。

离开这地方以后我又在毛金饭店里找到一件同样的工作。这个大饭店现在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然而那时候（距今十三年前）它的厨房的确是很可怕的。在那里面一扇窗户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倘使电灯一旦熄灭，房里就是完全黑暗，人一举一动非和器具相撞不可。在洗涤碟子、锅、刀、叉、调羹等等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混杂着灰尘和污物，慢慢地落下来，我在下面作工，它们便一点一滴地打在我的头上。工作的时间中厨房里热得真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余都倾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

希望之国

边,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污水槽又不能直接通到沟渠。污水常常满溢而反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在厨房中央有一根排水管,每晚那管子总会给闭塞住,油水愈积愈高,于是我们只得在油腻的水里走来走去了。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第一天作十二小时,第二天作十四小时,如此轮流下去,每隔一个星期日可以休息五小时。我们的饮食几乎连狗吃的也赶不上。工钱是每星期五六元左右。我作了八个月的工以后便离开了那里,为的是怕得肺病。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年头。哪个工人会不记得?穷人们都睡在露天里,终日在垃圾桶里翻来覆去地找一片白菜叶或一只腐败的马铃薯。我在纽约漂流了三个月,把纽约的街道都走遍了,然而一件工作也找不到。一天早晨我在觅工处里遇见一个比我更不幸更无靠的青年。他从昨天起就没有吃东西了。这时自然还是在挨饿。我带他进一个饭店去,几乎把我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请他吃一顿饱饭。他狼咽虎吞般地吃完了。他吃饱以后便劝告我,说再留在纽约是没有用的。他说,倘使有钱,他便会到乡下去,在乡下找工作的机会比较多,还不用说那人人可以自由地享受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我把剩下的一点钱拿去买了船票,这天就搭小火轮到康涅狄格州的哈得富尔城去。

从哈得富尔我们又到另一个小城去,我的同伴在那里住过,但这个小城的名称,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们沿着大路步行,后来居然鼓起勇气去敲一个乡村人家的门。一个美国农夫开了门出来。我们便问有没有工作给我们做。他并不需要

什么人，然而他被我们的穷困和十分饥饿的样子所感动了。他款待我们吃了一顿饭，然后陪着我们走遍全城去找工作。连一件小的工作也找不到。他很怜悯我们，虽然他用不着我们帮忙，可是他也把我们带到他的田庄上做工。他留我们住了两个星期。我永远不能够忘记这个美国农人的家庭。他是第一个肯把我们当作人看待的美国人，虽然他知道我们是来自但丁和加里波的国土里来的。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去寻找一个肯拿面包和白水来交换我们的劳力的人，但这里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以后的漂流的详情细写出来了。我们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从一个田庄走到另一个田庄。我们敲过不少的工厂的门，都被赶走了……“没有事……没有事。”我们真正到了不名一钱的地步，饥饿不断地咀嚼我们的心脏。有一天我们找到一间荒芜的马房，可以在那里闭眼睡一夜，我们便觉得是很幸福的了。某一个早晨我们碰见了好运气。在南格拉斯吞拍立我们遇见了一个从皮德梦特来的同乡，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早饭。我们对于他的感激，自然用不着说。然而过后我们又不得不继续我们的令人失望的路程。在这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密德尔坦城，我们已经是十分疲倦，十分饥饿，而且冒雨走了三小时，一身都湿透了。

我们遇见一个人，便问他有没有意大利北部的人在这里（因为我的那个同伴是北部人，他不喜欢找南部的人）；他指点我们到附近的一个人家去。我们去敲门，出来了两个西西里

希望之国

岛的妇人，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我们要求她们允许我们在火炉旁边烘干我们的湿衣，她们马上客气地答应了我们，并不因为她们是南部的人，就对我们歧视。我们坐在火炉旁边烘衣服，一面询问她们在附近地方有没有找到工作的机会。她们告诉我们说这里连一件小工作也没有，不如到春田去，那里有三家造砖厂。

这两个好心的女人注意到我们脸上的青白色和我们身体的颤抖，便问我们是不是因了饥饿。我们老实告诉她们，我们从早晨六点钟起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做女儿的便拿了一小块面包和一把长刀给我们。

“我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们了，”她说，眼里掉下诚实的泪珠。“我要养活我的年老的母亲和五个孩子。我丈夫在铁路上作工，每天的收入不过一元三角半，而且更不幸的是，我最近又病了很久。”

我在切面包的时候，她又绝望地在房里东找西翻，最后找出了几个苹果来，她一定要我们完全吃下去。我们的力气恢复了，便辞别了这两个好心的女人，向砖厂那方向走去。

“那边有烟囱的是什么地方？”我的同伴忽然问道。

“那自然是砖厂。让我们到那里去找工作。”

“呵，现在太迟了！”他迟疑地说。

“那么，我们就到厂主家里去，”我提议道。

“不，不，让我们到别处去。那一类的工作一定会使你短命。你的身体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他反对说。

这是很显然的事情：我的同伴找了很久的工作，都没有效

果,于是连作工作的兴味也失掉了。这种心境是极其平常的。在受惯了失望与侮辱、饥寒与穷苦的压迫以后,那些失业的工人到后来甚至对于自身的命运也漠不关心了。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心境,它使得不幸者中间的那些软弱的个人永远成为漂泊的游民。

我站在那里尽力使我的同伴恢复他的常态,注意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想到我们刚才离别的的那个人家。我的回忆使我异常痛苦。她们今夜的晚餐少了我们先前所吞下的面包,不知会减少到什么样的程度;然而一想到我自身的苦况,我便暂时忘却了她们。我记起昨夜的情形,那寒冷的、不眠的长夜,这个回忆使我颤抖起来了。我低头看我自身:我的衣服差不多完全破烂了。

今天的黑夜又来了……

工作! 工作! 工作!

我几乎是用武力把我那漂泊的同伴拉进城里去的,在那城里我们两个都在造砖厂内得到了工作。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辛苦的一种工作。我的同伴实在受不下去,过了两个星期他就辞了工走了。我却整整做了十个月。那工作的确是超乎我的能力以上。可是每天工作完毕以后我却也得着许多快乐。在这里有许多从皮德梦特、多斯加尼、威尼斯等处来的侨民,这侨民区差不多成了一个家庭。到了晚上,白天的污秽的工作都被忘掉了。我们中间会有人拉提琴、奏手风琴或其他的乐器。许多人开始跳舞——我呢,不幸我从来对跳舞就没有兴趣,只得坐在旁边观看。我常常观察别人的幸福,因而自己也感到快乐了。

在这小小的侨民区里面患病的程度是很可惊异的。我还记得,怎样一个人一个人地相继染着热病。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人的牙齿在动摇。

从这时候起我的运气稍微好了一点。我便到康涅狄格州的麦立登城去,在那里的石矿中做不熟练的粗工。我在石矿里作了两年工,作的都是最辛苦的粗工;我那时候和一对老夫妇同住,他们都是多斯加尼人,我跟他们学习那美丽的多斯加

尼语,我感到很大的快乐。

我在春田和麦立登的几年中间,除了学会多斯加尼的方言外,我还学到许多东西。我学会去爱,去同情别人,那些人和我一样,时时准备着接受任何微小的工资,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我又明白阶级意识这字眼并非一般宣传家所捏造,这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力;凡能够认识它的真意的人便不会再做劳役的畜生,而是堂堂的人了。

我到处都交结了许多朋友,并不是我去找他们,并不是我故意要这样做。也许是我那些砖厂和石矿里的同伴们在我的眼里看出了我对他们的惨苦的命运的同情,从我的谈话里知道了我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在那里我们大家都可以生活得清白一点,快乐一点,不再过畜生般的生活。

我的朋友们劝我依旧到点心店去做厨师。他们说不熟练的工人在现在社会制度里算是最下等的东西。我要是这样做下去,非但不能维持生活,而且会永远被人轻视。一个住在纽约的同乡也写信来劝我。因此我便回到纽约去,不久就在百老汇路莎瓦林饭店里找到一个工作,给主要厨师当助手。我做了六个月或八个月就被辞退了。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我马上又到第七号路戏园区域的一家大旅馆里做和这同样的工作。然而过了五个月我又被辞退了。这时候我才明白被辞退的原因。原来主要厨师那时和觅工处订有条约,凡是觅工处介绍来的人,他们都要收用,他们辞退旧人的次数愈多,他们收用新人的机会也愈多,并且还可以得着他们的佣金。

工作! 工作! 工作!

和我同住的同乡们都劝我不要灰心。他们鼓励我说：“不要放弃你这个职业。只要我们能够给你房子住，给你饭吃，你就不必焦心。并且倘使需钱用的时候，请你马上告诉我们。”

伟大的心灵常常是在平民中间的。呵，你们法利赛人啊！

一连五个月我踏遍了纽约的人行道，找不到一件合于我的职业的工作，便是想给大厨房洗碗碟也没有人要。后来我偶尔在毛伯利街一家觅工处里找到一件泥水匠的工作，我和一群衣服褴褛的工人被引到麻沙秋谢州春田附近的树林中的一个收容所里，在那里作建筑铁路的工作。我在那里作工，得的工资全都存储起来，我在失业的时候所欠的一百元的债都偿清了，还剩余了一点，于是我便辞掉这里的工作，同一个伙伴到乌斯特附近的另一个收容所去。在这附近我住了一年多，在几个工厂里作工。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到现在我每记起他们，我便起了强烈的感情，而且怀着不曾改变过也永不会改变的友爱。这些人中间有几个还是美国工人。

从乌斯特我又到普立毛斯，这是约莫七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我被捕为止，我不曾离开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引起了我的真挚的喜爱，因为它一天一天地把许多的人拉近我的心，和我同寄宿的人，在我周围作工的人以及那些向我买鱼的妇人都成了我的亲切的友伴了。

我在那里作了一年多的石工，随后又在一家制绳公司作了十八个月的工。普立毛斯制绳业罢工潮发生，我是一个活动分子，因此我便被辞退，而且以后也找不到任何工作。……事实上因为我常常在各种工人的集会中间演说，以后差不多

弄到了在任何地方找工作都不容易的地步。有些工厂把我当作不好的工人，绝对不肯雇用。然而所有曾经雇用过我的厂主都不能不承认我是一个勤勉而可靠的工人。我的唯一的过失，便是我极力想把一线理解之光带进伙伴们的黑暗生活里面。

我也曾在这城内散生杜南建筑公司里作过一些最粗重的工作。我几乎可以说在普立毛斯所有主要公共事业中都有我的劳动的痕迹。这城里所有的意大利人以及各工厂的工头可以证明我在这时期的生活是异常节俭，而且又是十分勤勉的。在这时候我又深深感到对于智的方面的兴趣，我怀抱着大的希望，这希望燃起我心头的火，便是在现今当我在这黑暗的监房里为着一件我并未犯过的罪名等候死刑的时候，我还是如此强健，如此坚定。

我的身体不很好。多年来的苦工和失业期内的更可怕的情形渐渐消耗了我的精力。因此我想找一件合于卫生的工作来延长我的生命。约莫在我被捕前八个月，一个朋友预备回意大利去，他向我说：“你为什么不买我的小车，我的刀，我的秤去做一个鱼贩子，免得再来受什么老板、工头的束缚呢？”我便趁这机会买了他的小车，此后就成了一个鱼贩子，这大半是因为我喜欢独立的缘故。

在那时候（一九一九年）思乡病来到我的心头，我很想再和家里的人见一面。父亲每次来信都叫我回去，近来他的希望更急切了。我的好妹妹鲁意加也来信帮忙父亲劝我回去。我的生意并不大好。然而我像一个负重的畜生一样地拚命劳

工作! 工作! 工作!

动,一天一天地过着机械的生活,没有休息过。

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圣诞节的前一日,是我在这一年里卖鱼的最后一天。在这天里我很忙碌,因为意大利人在圣诞夜的筵席上总要有鳗鱼吃。一九一九年的圣诞节那一天非常冷,而且以后也冷得厉害。我推着小车沿街卖鱼,那样的劳动也不能使身体暖和一点。过后我便去找一个更吃力的虽然也是冷的工作来做。圣诞节后不几天,我便去替披特塞尼先生做敲冰的工作。有一天他没有工作给我做,我便去给电灯厂铲煤。敲冰的工作做完,我便到好南特先生那里,做掘沟的工作。后来落了大雪,我便又成了一个空闲的人。但这也只是几个钟头的事。几点钟以后我又到城外去扫除街道上的积雪,以后又去扫铁路旁边的雪。过后我又受雇于散生建筑公司给某毛织物公司安放水管。我一直做到这件工程完毕时为止。

以后我又失业了。铁路工人罢工,断绝了水门汀的供给,因此建筑工作也做不下去了。鱼的来源也是有限制的。我能够得到鱼的时候便去贩鱼,不然我就去捕蛤;然而捕蛤的工作利益既小,费用又大,实在不合算。到了四月我和一个渔人订了合股的条约,这条约是不曾履行的,因为在五月五日我正预备召集群众大会来抗议同志沙尔塞多在警察署中被害事件时,我便被捕了。和我一起被捕的是我的好朋友和同志 N·沙珂。

“又是一件驱逐的案子,”我们对望着说道。

然而这次并不是这样。全世界现在所知道的那个凶恶的

罪名竟被加到我们的头上来了。我被控告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布里支瓦得的抢劫未遂案的凶犯，经过了十一天我一生所仅见的最滑稽的审讯后，我便被定罪，判决了十五年的徒刑。裁判官是 W·退尔，后来审讯南布林垂强盗杀人案判决我与沙珂的死刑的裁判官也就是他。

当他宣告判处我们的死刑时，他的声音里不带着一点同情的颤动，我一面听他的话一面惊奇为什么他会把我恨到这种程度。所谓裁判官不是被人当作公正的吗？然而现在我想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简单的工人，一个外国人，一个激烈派。因此在他的眼里看来，我不过是一个奇怪的动物罢了。所以我这方面的证人虽然都是诚实的人，只知道叙说真理，但是却被人嘲笑轻视。为什么呢？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只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人的证据是可以相信的，而外国人呢？……呸！

我的精神生活与信仰

我还要略略回溯我的过去的生活。我已经把我的故事的物质的方面描写出来了。然而一个人的生活中更深更真实的故事,并不是在外部的情形,而在他的内心的发展,在心灵与精神。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都是在学校里读书。我真正喜欢用功,我在喀富尔度过的三年中间幸而认识一个有学问的人。我靠了他的帮助,便全读了我所能找到的出版物。我的头脑订了一份热那亚出版的天主教刊物,我以为这是很好的运气,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在吐林除了作工的伙伴、年轻的店员和工友外,我另外没有朋友。我的伙伴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且讥笑我的宗教的信仰,叫我做一个伪君子 and 执迷者。有一天我和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竟然因此打起架来。

我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倒有点熟悉了,我才知道他们那时候连这个名词的意义也没有弄清楚。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说是赞成亚米契斯的主张(当时正是亚米契斯的著作生涯极盛的时代),说是根据时与地的精神。这种环境给我的影响是如此真实,所以我不久也就爱起社会主义来了,虽

然我自己并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也不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倘使仔细来考量一下，这些人的发展的阶段对于我还是有利的，而且使我得了很大的进步。权利平等和人道主义的原理开始进了我的心里。我读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后来又读他的《游记》和《朋友》。

在家里还有一本圣奥古斯丁的书，其中有一句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心上：“殉道者的热血是自由的种子。”后来我又得着一本破旧的《神曲》。呵，我的牙齿咬不动这种骨头；然而我依旧绝望地想去嚼碎它，而且我相信这不是完全无益的。

在我快要离开意大利的时候，我又从医生弗南西司、化学家司克利麦利呵、兽医波三人那里得到不少的知识。我已经开始明白人类所受的最残酷的灾祸在于愚昧与自然感情的堕落。不久我的宗教就改变了，再用不着什么教堂、祭坛和形式上的祷告，对于我，上帝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人间性的完全精神上的存在。我父亲常常告诉我说，要抑制人间的激情，要安慰人类经历的苦难，宗教便是必需的。然而我觉得我自己有我的是非。怀着这种心我远渡了重洋。

到了美国以后我遇着一切的苦楚，幻灭和穷困；每个年轻人在二十岁左右不知道生活，心里充满着美妙的梦境来到这地方，都会得着这种结果。在美国我看见了一切生活的残酷情形，一切不义和腐败，人类正在其中绝望地挣扎着。

然而不管这一切，我依旧不断地努力使我的身心强健。在这里我研究了克鲁泡特金、高尔基、邵可侣、马拉铁斯达、麦

我的精神生活与信仰

林诺,我还读了拉布里阿拉的书,马克思的《资本论》、毕沙加勒的政治的《约书》、马志尼的《人的义务》和其他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在这里我读了各种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和宗教的刊物。在这里我研究了《圣经》、列朗的《耶稣传》和米塞波的《耶稣并没有存在过》。在这里我读了希腊、罗马的历史,美国史,以及法国大革命史和意大利革命史。我研究了达尔文、斯宾塞、拉普拉斯、弗拉马利洪诸人的学说。我重读《神曲》和《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我再读雷奥帕弟的书,陪着著者流泪。我又读雨果、托尔斯泰、左拉、甘都诸人的小说,居斯地、葛利尼、拉皮沙第、加尔都起诸人的诗集。

我的亲爱的读者,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卓越的学者。那样看法便是很大的错误。我的基本学识是不完全的,我的智力也不充足,不能消化这一切广泛的材料。而且请你们不要忘记我是做了整天的繁重工作以后才来读书,既无适当的环境,又无良好的工具。呵,我还记得有许多晚上我伏在案头研究一卷书,只靠着那一股飘摇的煤气灯光,我一直读到天明!我刚把头放在枕头上,工厂的汽笛就叫起来了,我只得起身到工厂或石矿里去。

但是我在这样的研究以外对于人类、动物、植物,简言之即对人类周围的一切事物,又作了一番继续的严厉观察,“生活之书”,那是书中之书!所有其他的书本都不过是写来解释这本生活之书,教人怎样去读这本大书罢了。我在这里指的自然是诚实的书;至于那些骗人的书本,那是只能使人误解“生活之书”的。

我反复思索、研究这本大书，结果就决定了我的行动和主张。所谓“各人为自己，上帝为众人”的话，我不承认。我袒护弱者、穷人、被压迫被虐待的人。我赞美英勇气质，我赞美牺牲，我赞美力量，只要它们是用来为正义奋斗的时候。我知道在上帝、法律、祖国、自由等等的名义下，在最纯洁的抽象观念的名义下，在最崇高的人类理想的名义下，最凶恶的罪已经被人们犯过了，而且还要继续犯下去的。要直到将来光明普照全世界的那一天，才不会再有少数人假借上帝的名义来向多数人作恶了。

我知道人不能够蔑视那些支配他的自然的法则，他也不能够打破他和宇宙间的连索。所谓天然的界限如山、河、海之类不过是由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的错综而形成，它们的形成比人类早，然而它们决不是生出来划分人民的。

我的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以为谁加惠或伤害一个人便是加惠或伤害全个种族。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相信义务、权利、事实三者的平等是一个正当的人类社会的唯一的道德的基础，只有在这基础上，正当的人类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我用我的诚实的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我知道生活的最上目的就是幸福。而人类幸福的永久不变的基础便是身体健康、良心平静、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一个真诚的信仰。每一个人有两个“我”：实际的我理想的。第二个我才是一切进步的泉源。若有人想使第一个我和第二个

我的精神生活与信仰

我相等,这是错误的。在任何一个人里面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的差别永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是完满或是堕落,这两个我中间的距离总是一样。

我以为一个人很难完全节制自己,真正的智慧在于宽容。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着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

我以为意志的自由是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我尽力想使人类精神趋向着众人的福利一方面。我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在人类还未能趋向完满以前,权利和特权仍会被人用武力维持下去。

在将来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特权和阶级等等,都要废除了。在未来的人类的真正历史里,进步和改革都要用智慧与公共利益决定。

假若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还不走近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到什么真实的东西,而人类也会继续陷于更不幸更困苦的境地里面。

我是一个安那其共产主义者,而且只要我不曾发现我的错误,直到最后的一刻,我还会是一个安那其共产主义者;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安那其共产主义者,因为我相信这主义是社会契约之最合于人道的形式,并且我知道人只有靠着自由才能够自立,才能够成为高尚,成为完全。

现在在三十三岁(耶稣基督的年龄,据某一些精神病研究者说,又是普通犯罪者的年龄)我便被监禁而且被判决死刑了。然而倘使我能够再开始来走一次“生活的旅程”,我一定

要重踏旧时的路,并且一方面尽力减少我的错误和过失,一方面增加我的良好的行为。

最后我以兄弟般的心情致友爱的,热烈的祝福于我的同志们、朋友们以及一切善良的人。

我底眼泪*

正是在旧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书，这是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的书信集。淡黄色的封套上面印了某杂志的评语，读出来是：“不预备为着生活的恐怖与美丽一哭的人就不要读它。”

可是我还不曾翻开书页，我还不曾读到书中的第一句话，我的眼泪便流出来了。不能够忘掉的四年前的旧事又来到了我的心头。我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日子里去了。

那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五层楼上。不论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门大打开。下面是一条清静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从我的窗里可以望见人们在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正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它不但拦住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的房间里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出生在温暖明媚的国土，我又来自山明水秀的江南，现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十期。发表时作者作有如下的附记：“本篇除了根据自己底经验而外，并参考我在巴黎收集的三四种文字的材料。篇名之所以为《我底眼泪》者，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写的时候我确实曾流了眼泪。”

在我却定居在这个不日之城，又是在这阴雨连绵的时候。

在这个城里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常常来看我，有时候一个来，有时两三个来，有时五六个一齐来，我们便有一个欢乐的聚会，使我暂时忘记了寂寞。但是这样的事一个星期里也只有两三次，因为朋友们都有自己的事：有的在大学里读书，有的在工厂里作工。晚上在朋友们不来或者来了又去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一阵难堪的孤寂紧紧抓住了。充满了煤气臭的屋子变得更气闷。我从窗户望出去，高耸的古建筑物挡住了一切，下面躺着雨湿的街道，阴暗而清静。有时候在一阵静寂之后忽然空气震动了，街道震动了，连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如果有人房里谈话，我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只有等待着。并不要多久，这些声音就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又过去了。一切又回到静寂里来。我立在窗前，埋下头看那在微暗灯光下的街道，或者街角的咖啡店，听人们在说话或者偶尔经过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空虚了，好像胸膛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一般。无论如何我不能在房里停留下去，似乎多留一刻就会使身子僵硬。于是我拿了帽子，披了外套，急急地跑出房门，下了楼梯走到街心去。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踌躇了。我呆呆地立着，帽子遮住了我的头，外套保护了我的身体。但是雨点还时时向我的脸飘来，我终于向咖啡店那边走了。

进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阵温暖。我立在柜台前要了

一杯黑咖啡，一面望着旁边几个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诚实的脸，我把杯里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钱又踉跄地走出来。虽然咖啡店里有亮光，有温暖，有人声，但是我却一点也不顾惜地抛弃了它们，向着清静的、阴暗的、雨湿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出。

我只是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寥的三两个行人，尤其是国葬院旁边一段路最清静，而且有点阴森可怕。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骚铜像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头仰望那个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说了许多话。这些话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话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①和我。一直到圣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我才踉跄地站起来，向着热闹的圣米雪尔大街的方向走了。

我走着，在微雨下面走着，我不想到什么人家里去，也不想找人谈话。我走过热闹的街，我也走过清静的街。我看见了不少的人，许多愉快的面貌在我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许多忧愁的面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咖啡店的音乐、笑语和歌声，同样我也听见悲哀的谈话和诉苦。

这一切于我是亲切的，但又是陌生的，它们增加了我的心痛。这个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人。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每个人，每所房屋对我都保

^① “日内瓦公民”：指卢骚铜像。卢骚(J. J. Rousseau, 1712—1778)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杰出的思想家。

守着秘密，无论是欢乐或愁苦，他们都不肯同我分享。我徬徨着，好像一个失掉向导的盲人一样，一直走到快要迷失了方向，我才绝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像这样的事在我也并不是偶然的。白天我也进大学去听课，到图书馆里去抄书。我想在课堂里和书本上找到一点东西，结果依旧剩下我这颗空虚的心。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便突然袭来，我又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中徬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样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的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的面貌，我的耳里只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甚至在那些从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的痕迹。我的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纸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的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自尽、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一条新闻都在诉说一段悲惨的故事。报纸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处徬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立在卢骚的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

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少了我的足迹。我只是到处徬徨，像一个没有向导的盲人一样，准备着失脚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

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了一

个意大利鱼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好像大雨住后的天空那样，我的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同时还买了两三本跟这个鱼贩子有关的小书。我读着，重读着，我读完了这个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在双亲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岁，后来被父亲送到别处去当学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亲接回家受母亲的看护。他的病好了不久，母亲却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因此他不得不时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过往的行人另走一条街，不要惊动他的母亲。母亲的病愈来愈重，父亲同亲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终日守在病榻旁边尽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两个月不曾脱衣服安静地睡过一夜。然而“科学没有用，爱也没有用”，他的母亲病了三个月，终于死在他的怀里。他亲手把她放进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够在故乡住下去了。他决定到那个所谓“希望之国”的美国去。临行时他的父亲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妹妹痛哭。邻居们都来看他。每个人都送来了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地跟着他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美国，他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地上了岸，带着几件破

衣服，身边只有很少的钱。他后来在一家大饭店里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个地狱似的厨房里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几乎赶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在洗碟子、锅、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挟带着灰尘和脏东西慢慢地落到人的头上。在工作的时间里，厨房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汤剩菜都倒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边，时时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阴沟。污水常常满溢而倒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厨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会给堵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人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他害怕会得肺病，在那里做了八个月以后就离开了。他四处漂游，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做了一个鱼贩子。

他的故事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最后他又告诉我们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以后又去探求知识。许多个晚上他伏在案头读书，在颤抖的煤气灯光下一直到天明。他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常常跟着书中人一起流泪。天一亮他就阖上书，把头靠在枕上。并没有多久，工厂中的放汽声响了起来，他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厂或者矿里去。

这样他竟然变成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像小说《波士顿》^①的作者所描写的。他在那本小书里用了四页的篇幅写出他的精神生活与信仰：

^① 《波士顿》：美国作家阿普顿·辛克莱（U. Sinclair, 1878—1968）的长篇小说。当时他还是进步的作家。

我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伟大的心灵常常来自人民中间！

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同一个朋友一起被捕。别人说他们是杀人的强盗，说他们在大街上抢劫别人的钱。法庭判决了他们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们有“犯罪的意识”；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夺制度；他们在欧战时期不肯到法国去替美国资本家打仗，却逃到墨西哥去；他们是下贱的外国人。第一次请求再审，被驳回了，……一连被驳七次，所有新的证据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师最后根据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请求，也没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罚”折磨了六年之后，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决定——七月十日，电椅。

然而反抗的呼声起来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从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发出要求“宽恕”或者要求“正义”的喊声。似乎整个世界都为了一个鱼贩子和一个鞋匠的缘故活动起来了。

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我每次翻读那本鱼贩子的自传，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囚室里的景象，一个中年人的朴实的脸，浓浓的眉，安静的眼光，浓密的须髯，接着又是一双肥

大的手遮住了一切。这双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后，我的眼前又换了数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这无数的手一齐挥动，成了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

街上到处贴着大张的广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这个大题目下印了什么“演讲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宣言和会议程序。这些广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学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柜台前或者公园的门口，我常常听见人们激动地谈起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看见许多人为他们募集了捐款。

于是我不再在卢骚的铜像前哀诉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导的盲人。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向导。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意大利的鱼贩子在我的眼前变成了比“日内瓦公民”还要伟大的巨人。“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于大学里、学院里、书斋中、研究室里了。他是在金圆国家的一个监狱内，一个刑事犯的囚室内。

于是我怀着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朝圣地的进香客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寞冷静的屋子里，用大张的信纸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信发出了，恐惧又来压迫我了。我害怕我的信不会达到德丹监狱，我害怕金圆国家的人真会把他们烧死，虽然在全世界中有许多万许多万人要救他们的性命。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报上我常常读到女人和儿童写

的动人的信。整个“不日之城”都因为这两个人的生命骚动起来了。同时那个鱼贩子又不断地从监狱里写信到世界各处，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献，里面充满了生活的恐怖与美丽，每个人读了都要流泪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的恐惧也增加了。我的眼前时常现出电椅的可怕的形象。这期间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得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除了一包书外，还有一封英文长信，一共是四张大的信笺，而且是两面写的。我看见颤抖似的笔迹和奇怪的拼字法与文法，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热烈地读着这封信，声音和手都抖得厉害，我每读几行就要停顿一下，因为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谢的句子开始的。他感谢我的同情和信任，他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又说：“你必须再生活若干惨痛的岁月，才可以懂得你给了垂死的老巴尔托以何等的快乐和安慰。”接着他又用诚恳的话来安慰我，劝勉我，叫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于是他用他的有力的论证跟我谈起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未来的革新，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又跟我谈起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跟我谈话像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兄弟。他说他应该使我明白这一切，以后我才会有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斗争，不致感到幻灭。他叫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帮助人。最后他还以兄弟般的快乐的心情拥抱我。

四页信笺就这样地结束了。我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我把信拿在手里，读了又读。我终于伏在桌上

哭了。

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了面对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说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经历惨痛的岁月，即使那个“全世界中的最优美的精神”会消灭在电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这期间好的消息传来了。麻省省长把那两个无罪的人的刑期延迟了一个月，又聘请了一个“顾问团”来审查这个案件。这三个委员是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任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職的老法官。希望来了。谁也不会相信哈佛大学校长甘心做杀人犯。大家以为他们一定会把两个无罪的人救出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门前看见人们互相握手庆祝。他们以为公道就要出现了。这时候“宽恕”与“正义”的呼声更漫天地响了起来。

然而晴天里忽然起了一个霹雳，御用的学者们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小说家写信给他的校长说：“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政治谋杀犯，而且还以一个残酷愚妄的、反对人道与文明的罪恶来玷污哈佛大学了。”一个大杂志的主笔也说：“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养成刽子手的地方了。”原来学者们审查的结果是——哈佛大学校长说：“总之……有罪；”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说：“是的；”退職的老法官说：“法庭不应当受人指摘。”自然省长也同意他们的主张，他的决定接着也发表了。

八月十日来了，虽然“正义”与“宽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然而在那边，金圆国家里的“贵族”们是听不见的。决定的日

子终于来了。波士顿的中夜是巴黎的早晨五点钟，这个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曾阖眼。我自己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我无目的地在街头徬徨。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好像是梦景。我望着“不日之城”的红天，望着那两个整日整夜哀鸣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里不能够闭眼。我找出了刊载那个鞋匠给他六岁女儿写的信的报纸。我读着：

……我非常爱你，爱你哥哥，爱你母亲。我若得和你们同住在一处，在一所小小的田庄上，跟你学习你的真诚的语言和温柔的爱情，那就是我的艰苦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日子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开始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在树丛中摘取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另一株，又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们都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下层阶级的梦魇已经使你父亲的心灵变成非常愁苦的了。本来世间一切美与善的东西都是大自然母亲给予我们大家的，为着让大家自由享用。但是这个垂死的旧社会的人却把我生生地从你哥哥和你可怜的母亲的怀里拖走了……

我不能够再读下去。我想像着临刑的一刹那。我想着那个从故乡赶来巴黎，再越过大西洋去和她分别了十九年的哥

哥诀别的女郎。我想着那个为着丈夫的生命奋斗了七年的女人。我又把旧报纸找出来翻读，无意阅读到了“援救会”的两个电报。

一个是给鞋匠的：

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

另一个是给鱼贩子的：

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地位。你们要活下去。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来吻你。

我的心啊！

这一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勇气出去买报。一个人坐在家里思索。朋友吴走了进来，并不敲门。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欢喜地、热烈地说：“他们还活着！他们决不会死。”

我才知道昨晚临刑前二十六分钟，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万分痛苦的时候，省长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决定。

“好一个‘希望的刑罚’，跟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里的快乐。

朋友吴还抱着乐观主义，他诚恳地、快乐地对我说：“我给

你担保，他们不会杀死这两个人。”他的眼里闪着发光的東西，他喜欢得流泪了。

于是我又经历了十二天的希望与恐惧。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地我都看见那个可怕的阴影。“不日之城”被一种空幻的色彩笼罩着，人和物都好像在梦里一样。在我的耳边依旧响着“正义”与“宽恕”的呼声。但是声音比从前抖得厉害了，里面充满了眼泪和愤怒。在街头，在咖啡店里，在公园内，在各地，人们常常用带泪的声音谈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个巴黎，整个享乐的巴黎都为那两个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经历过不少惨痛的日子，也许还要经历更长久的时间，更惨痛的岁月。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十二天里面这样地懂得生活的美丽与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总统钓鱼去了。省长玩高尔夫球去了。联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们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法律是要执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惧与骚动中我度过了这个痛苦的夜晚。

我没有梦，我也不能够有梦了。

我害怕看见第二日的天明。

阳光射进我的窗户，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痴痴地望着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买了一份报纸。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见下面的一些大字：

全世界的良心从没有像今天早晨两个无罪的人被害的消息传来时这样地空虚的。

我几乎要把报纸落在地上了。

我又读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灭亡了。

我连忙回到旅馆，朋友吴已经在我的房里了。他把头伏在报纸上，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句：“他们死了。”他忍不住哭起来。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说他们的举动像罪人一样，便发见他们犯了谋杀罪。然而在临死时他们的举动又跟历史上的另一个人（耶稣）的举动一样，而且也像他那样地说：‘我宽恕你们！’可惜太迟了。没有重新判决的机会了。”朋友吴忽然翻开他带来的报纸用抽泣的声音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他又接连地说了两句：“可惜太迟了，”便站起来摸出手巾揩眼泪。

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没有出门，我也不想吃饭。我写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这个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声说：“两个无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还在写信，朋友卫气咻咻地推了门进来。我不见他有一个多星期了，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夜深跑来，而且衣服凌乱，头发飘散，面孔通红，他那副平日离不掉的宽边眼镜也没有了。

“什么事？你这个样子？”等他坐好我便问道。

“我才知道法国政府也是站在杀人犯那边的，”他愤愤地说。

我惊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们到美国领事馆去示威……那么多的人……挤满了好几条街……群众大声叫着‘杀人犯’。声音跟响雷一样……警察保护着领事馆，要群众散去。……后来起了冲突，秩序乱了……几个报摊子也被挤倒了……大队的警察赶来解散群众……我和吴被挤到一个咖啡店里，接着又来了一些参加示威的人……忽然这个咖啡店被包围了。大队警察守在门口叫里面的人全出去。出去一个打一个，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见吴挨了几下打。我跟警察冲起来。后来我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我刚起身，就被一群人拥起走了。我的眼镜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我去找吴。我看见一个警察在追他。他吓得乱按人家的门铃。……后来他找到我了。我看见他很萎顿，便把他送回家，然后到你这里来。……我倒没有受伤……那些狗！……”愤怒堵塞了他的咽喉。

我们对望着，我们用眼睛表示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我们互相了解了。

圣母院的钟突然哀鸣起来，已经到了中夜。

“卫，回去罢，”我短短地说。

他突然站了起来。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他用极其坚定的声音说：

“金，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活更多的年月，我们还要经历更惨痛的岁月，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晚罢。”

他毅然地去了。

如今四年又过去了，朋友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被伤寒症毁了的。他故乡的家里还剩下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我不知道她们靠什么生活。朋友卫还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也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生存或者已经死亡。我自己呢，我漂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经历了多变化的生活，我有过好梦，我也有过梦魇。而且我也有过——“原野的新绿，海洋的碧波，花的香，果的甜，湖水里映出的蓝天，歌唱的激流，微语的小溪，山谷和峻岭，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丽的月亮，落日，黄昏，星夜，”如那个鱼贩子所曾有过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总不能够忘记那个给了我巨大影响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个思念折磨着：我辜负了我的“先生”，我忘记了他教给我的话，我并不曾履行我给他的诺言。我把四年的光阴完全浪费掉了，也许我将来还会浪费掉更多的光阴。然而我的美丽的青春快要完结了，它是不会再来的了。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接到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够不流眼泪么？

1931年。

电 椅*

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在美国麻沙秋谢省被判决了死刑。

全美国因为这件事像火山那样地沸腾着,但查理斯顿监狱却是平静的。

和平的波士顿城成了骚动的中心,但查理斯顿监狱却是平静的。

这个监狱是麻省的最大的监狱。在这里面从一八〇五年到现在不知道执行了多少次的死刑。这监狱就是在一八〇五年修建的,所以门楣上还有“1805”的字样。

这个监狱在北城外,在一条清静的大街上。建筑是很堂皇的,铁栏杆里面还有树,还有花。花常常开得很鲜艳。谁走过这里,决不会想到这是一座监狱!

秋天快来了。在这儿秋天是很美丽的。每朵花,每棵树,每片草都沐浴在温和的秋天的阳光里。人也不是例外。所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电椅——献给一个神圣的纪念》。

有时候在这一带地方就响起了小孩们的歌声和笑声。

小孩们也常到狱墙外面玩，狱墙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种了一棵枫树，枫叶在秋天变得比小孩的脸颊还红。到落叶的时候小孩们就常常争着去拾枫叶。他们会发出许多、许多清脆的笑声。

这一年秋天似乎来得早一点，在八月里天气就凉爽。住在这儿，人沐着阳光，看着枫叶，听着小孩的歌声，这应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这儿有许多人，他们整天关在一间窄小的囚房里，等待着“死”来把他们抓去。

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做巴尔托·樊塞蒂的意大利人。他跟别人不同。他整天伏在一张小铁桌子上面写信。这个人的相貌奇怪。他有一个宽广的前额和一对浓浓的眉毛；他有安静的眼光，嘴唇边搭了两撇浓密的须髭。他还有两只肥大的手，他写字的时候，肥大的手握着笔微微地抖动，纸上的字迹表示出心上的颤动。

在这些时候天黑得迟。人吃了晚饭后等天黑，总要等许久。在死囚牢里，散步的权利是不存在的。这个意大利人只有躺在铁床上睡觉，或者在囚房里走来走去。

在一个傍晚，狱墙外面小孩们的歌声清脆地响起来。这些声音飞着，飞得很高，飞过了狱墙，飞到这个意大利人的囚房里。在这时候这个人正躺在铁床上，睁着一对大眼睛，望着逐渐加深的黑暗。

他很倦，因为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他才终止了绝食，他好多

天不曾进食了。他的身体因此变得十分衰弱，这一个多星期的进食还不能够使他复原。其实他永远没有复原的机会了。

他的眼光似乎是茫然的。其实并不是。他看见的事情多着呢。墙挡不住他的眼睛，城也不，山也不，海也不。他看得很清楚，在任何时候他都看得很清楚。

在海的那边，在河的彼岸，在山的脚下，那儿就是他的家。山是一带美丽的小山，每天早晨都要被朝阳镶上一道金边，每天晚上都要被夕阳罩上一层红纱，它们永远躺在蓝天底下。

提起他的家，真叫人怀念。慈祥的老父，两个可爱的妹妹，她们最近还有信来，在这些信里她们常常写着使人流泪的话。她们写这样的信，差不多写了七年了，因为他被关在监牢里就有了这么长的时间。她们的信里充满了信任和希望。她们至今还相信他是没有罪的人！她们至今还希望他会活着出来！

他离开故乡已经十九年了。这中间他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在故乡人们的生活也是很不幸的。父亲一定更衰老了。前一次妹妹的来信不是说父亲近来常常整天地咳嗽吗？他还记得父亲的面貌：那样瘦的脸，忧愁的眼睛，灰白的头发。他离家的时候父亲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有他的妹妹，那个最小的妹妹鲁意加，在他离家的时候她抱着他大声哭，她不过是十一二岁的女孩。可是她如今长成人了。她居然单身到法国，而且又横渡大西洋来看他了。

她还没有到，但是他已经接到法国朋友拍来的电报了；

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来吻你。

他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又快过一个星期了。鲁意加并没有来，现在离他的刑期就只有三天了。如果没有意外事情发生，在二十二日的中夜他就会烧死在电椅上面，这样地结束七年来的艰苦的斗争。

死，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可怖的阴影在他的头上盘旋了六年。六年，这不是短的时期！他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一个人心里有那么多的爱和恨的时候，他怎么死得下去！

提到死，他的愤怒就来了。他是在七年前被捕，六年前被判决死刑的。他为什么应该死？他一生不曾杀过一个人，偷过一件东西，流过别人的一滴血，抢过别人的钱。然而他却因为强盗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人家说他在白天，在大街上，放了手枪，杀了人，抢了钱。他们有证据吗？是的，他们找到了三个古怪的证人，这些证人居然可以从肉眼看不到的距离以外看清楚他的面貌。自然他这方面也有证人，他的证人几乎比他们的多过十倍！他们可以证明他那一天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总之他们可以诚实地证明他是无辜的。但是法官一口咬定说，这三十一个证人都是不可靠的，都是说谎的人。那个坐在金圆堆上的老法官，那个有着猴子脸的法官，那个在法庭里服务了多年的法官，那个常常穿大礼服戴高帽在大戏院的包厢里和高等俱乐部中出现的法官，在那个法官看来，靠着

自己两只手劳动谋生的男男女女怎么能够说真话呢？他们从来就没有学过礼节，他们从来就没有进过大戏院的包厢和高等俱乐部，他们连大礼服也没有一套！他们这些说谎的人！而且他们还是意大利人，爱吃面条的下等意大利人！而且如今法学更进步了。金圆国家里发明家自来就很多。现在法官又发明了“犯罪意识”这个罪名。就是说，从你的思想、说话和态度看来，你一定杀过人。这个鉴定是不会错的。

自己不曾抢过钱杀过人，如今却在强盗杀人的罪名下被判了死刑。那许多有金钱、有地位的人都嚷着：“有罪，一定有罪，我们的法官是不会错的。”虽然从世界各处发出吼声来说：“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求释放他们！”但这是那些没有金钱、没有地位的人的正义呼声。在这时候那些人的呼声还不能够救出他们来。那些人说“释放他们”，因为还有一个跟他陷在同样命运里的同伴。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年纪比他轻，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这个人是他一起在七年前被捕，六年前被判死刑的！这个人的囚房就在他的隔壁。他搬到这里以后，每天都可以听见这个人的叫声，或者这个人跟妻子谈话的声音。

听见尼克（这个人的名字是尼可拉）跟妻子罗沙谈话，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尼克的年轻的妻子是意大利南部的美人。她的小小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爱情，那么多的勇气。她热爱她的丈夫，每次来看他，总要说许多安慰的话。话是那么甜蜜，只有女人才说得出口！这个小女人，她那么勇敢地奋斗了七年来营救尼克。就在这个时候，在一切都似乎完全绝望的

时候，她依旧没有灰心。

譬如最近的一个悲惨的景象，至今还印在他的脑子里。尼克绝食了三十多天。一切的办法都用尽了，尼克依旧不肯进食，他说他宁愿饿死不愿意从资产阶级的正义那里哀求什么东西。强迫进食施行过了，也没有用。后来还是罗沙进来劝他。她守着尼克哭。尼克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微弱地呼吸，睁起疲倦的眼睛爱怜地望着罗沙。他的眼里也淌下泪来。

罗沙，她说了那么多使人心软的话，然后就用汤匙把饮食喂进他的口里。他只是略略地动一下脸。他慢慢地把饮食咽下去了。罗沙的脸正俯在他的头上。她的眼泪滴到他的脸上。他微微地笑一笑，对她说：“不要哭了，你看我已经让步了。”

自然这个景象巴尔托不曾亲眼看见。但是别人告诉了他，而且他知道那两个人，他相信他们会这样做。这一对夫妇是他很熟习的。尼克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平日很辛苦地劳动，积了一笔小款子，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他白天在工厂里做工，傍晚回到家里，就经营自己的小小的菜园。他和他的可爱的妻子过得很好。他们有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孩子起了意大利最伟大的名字——但丁。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是他进了监狱以后妻子生产的。

这一对年轻夫妇的生活在一般人看来算是幸福的了。但是他们并不满意。他们不是利己的人，不是盲目的人，所以他们要做点事情给别的整天沉沦在忧愁和眼泪中的人带来幸福。这样他们就成了社会主义者了。

社会主义者，这跟强盗杀人犯究竟是两种人！但是人家

却说是同样的名词，人家硬把他抓住，说他在大街上放了手枪，杀了人，抢了钱。证据呢？大法官发明的“犯罪意识”不就是证据吗？尼克有证人到法庭来证明，在所谓犯罪的时刻，尼克是在某某地方。他的证人有三十二个，而且还有别的物证。但是这些证据都是不可信的，因为都是另一个阶级提供出来的。这些没有金钱、没有地位的靠着两只手劳动的人算得什么呢？在金圆国家的老法官的眼里看起来不都是该死的吗？不都是“私生子”吗？那个穿惯大礼服、进俱乐部、打小高尔夫球的老法官就用“私生子”这个字眼骂过他们。省长也这样骂过他们。那三位学者也这样骂过他们。那三位学者是省长聘请来组织“顾问委员会”审查他们的案件的。审查的结果是：“总之……有罪。”

那三位学者，都是金圆国家里有名望的人物，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罗威尔先生。哈佛大学，这个可敬的文化机关，甚至从太平洋另一端的古老的中国也要派出一些富家子弟每年每年到这个大学去读书。哈佛大学，这不是麻省甚至全金圆国家的最高学府吗？那位老校长不是挣红着脸骂过尼克的证人为“说谎者”，后来又满脸羞惭地跟那个人握手道歉吗？但是这个老校长却武断地说：“总之他们有罪！”还有那位麻省工业专门学校的老校长和那位退休的老法官，他们都说：“法庭是不应该受指摘的。”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应该维持的呀！

总之，整个金圆国家都动员起来谋杀他们这两个外国工人了。是的，他们不过是两个渺小的工人。他，巴尔托只是一

个散工，他又是个鱼贩子；他的同伴尼克，那是一个勤俭的鞋匠。他的手艺是很好的。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抵抗金圆国家的法律机器呢？他们有什么办法把自己从金牛的脚爪里救出来呢？

那个省长，圆圆脸的麻省省长，他把他们的刑期推迟了一个月。他动手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不是到监里来看过他巴尔托，并且跟他谈过一个半钟头的话吗？那个圆脸的绅士，他不是带着微笑跟他握手，而且注意地听他谈话，而且说愿意带给他巴尔托正义吗？那时候他几乎要相信那个短小的圆脸人会给他带来正义了。他忘记了那个短小的圆脸人是一个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他有许多大工业的股票，而且准备在下届总统选举里面做一个竞争者。那个短小的圆脸人，他被列在成功者之林。他还想得到那些大资本家的帮助进一白宫，尝一尝合众国元首的滋味。未来的美国总统，现在的麻省省长，他在《成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把各派社会主义者杀尽。如今他的机会来了。

省长的决定公布了：总之他们有罪。——电椅。他果然给他们带来正义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正义，因为从那个阶级的立场看来，他们出身另一个阶级的事实就是有罪的证据。省长在他的宣言里似乎明白地说着这样的话：我是一个省长！我还要做合众国的总统！我是那一般人的省长，而且我要做那一般人的总统！你们这两个下贱的工人，滚开去罢。

于是电椅！毫无疑问地，他巴尔托和他的同伴尼克就要坐电椅了，就在大后天晚上。时间就是这么急迫！六年前别

人就给他们准备好了电椅。电椅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放了六年，他就在电椅的阴影下面挣扎了这六年。六年，一共有两千多天，这两千多天居然像梦一般地过去了。这梦自然是噩梦，现在剩下来的还只有三天。这三天的时间和过去的两千多天比起来是多么短促！他自己非常明白，这一次他再不会活下去了。三天，一切的人都还活着，那个短小的圆脸人，那个送他上电椅的老法官，那个有庄严面孔的大学校长，以及许许多多穿大礼服、戴高帽的人都还活着，他们还要继续活下去，但是他却只有三天可活了。

三天，算起来还有七十多个钟点，他被关在窄小的囚房里，他的妹妹还在海上，蔚蓝的天空和金色的阳光的意大利还在海洋的那一边。南欧的景物是多么可爱。在麦古拉河畔就是他的家，那儿有浓密的树林，那儿有大石桥，河水常常是很清澈的，立在桥上就可以看见河床上的白石。那儿还有许多朴实的村民，他们曾经把他当作亲人一般爱过。他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跑来送别，带给他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甚至成群地陪着他走了很远的路。

他永远不能够忘记南欧的乡村。七年前他曾经打算回到那儿去，去跟他年老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妹妹在一块儿生活。但是他突然被捕了。他还想：这不会久的，他在监里不会住多久就会出来，回到南欧的故乡去。但是如今他只有三天可活了。三天，七十多个钟头，他还能够做什么呢？

囚房里有一方铁格子窗。他把眼睛往窗外望，只看见一段灰暗的天空。高大的建筑物给他遮住了视线。阳光很少透

他的囚房里来，而且他看不见月亮。

这时候的南欧，正是明月夜，曼陀林的柔软的调子从许多古老建筑物的窗里飞出来，荡漾在柔和的空气里；在一些临街的窗下常常有青年男子给他们的情人奏小夜曲，于是白纱窗帷就揭起来，露出少女的上半身。在河畔的大路上就有大群的青年快乐地沿途歌唱、呼啸，来歌颂初见的月亮和星星。在十九年以前他也是这些青年中间的一个。可是如今一切都完了。现在连南欧的故乡也给巨大的黑影罩住了。今天是八月十九，从十九日到二十二日中夜不过三天的功夫。他的妹妹也许明天会到这儿，也许后天会到这儿，也许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她，她来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时候他已经烧死在电椅上面了。

电椅，这个近代科学上的大发明：现在他要来享受了。这算是一种特权吗？他从前常常祝福科学，常常因为有着种种的科学发明，为人类、为自己庆幸。他第一次怀着寻求幸福的希望，离开蓝天的意大利来到这个“希望之国”的时候，他看见种种代替人力的新奇的机器，心里充满了喜悦，他满心以为这些东西以及一切的科学发明都是用来给人类谋幸福的，以为这个“希望之国”里果然贮满了幸福等着那些不幸的人。到后来他才渐渐地明白它们究竟给什么人谋过幸福了。现在他躺在这儿，就等待着科学的发明来取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一个普通工人的生命，一个鱼贩子的生命，还有他的同伴那个鞋匠的生命。在电椅上被烧死的就只有他们这种人。他们是属于另一个阶级的。电椅就是为他们而设的。那把金属的椅子，

他已经看见过许多次了。椅子上面垂着盔一般的帽子，中间是束身的带子，脚下有两个夹腿的镢子。他常常走过放电椅的地方，是人家故意引他去看的。他每次看见电椅就会生出许多幻想。从前有一个时期人家故意把他放在离电椅室最近的地方。常常在深夜他就听见人坐上电椅时发出的可怕叫声。他这时候不能够再闭眼了。于是就有脚步声走近他的囚房。他不禁恐怖地想：“我的轮值就到了罢。”

人间真是没有正义的！他的手是纯洁的，他的心里充满了爱，他的一生是清白的。然而现在那些穿大礼服、戴高帽、打小高尔夫球的绅士们却要把他送上电椅了。资本家、政治家、法官、商人、学者，一致地嚷着“有罪”，同谋来杀害他们这两个无罪的外国工人。人间真是没有正义的！……

钟声响了，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囚房里电灯燃得很亮，窗外是一段漆黑的天空。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一天又过完了。过了一天，他的生命里又少一天了。日子就过得这么短！听说今晚上有一个犯人要上电椅，一定又是一个跟他同类的人！

电灯灭了。他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他想着他那个远渡大西洋的妹妹，他想着他那些忠实的朋友，他想着他的同伴尼克，他想着正在斗争中的他们的这个阶级。然后他又想着那个猴子面孔的老法官，那个短小的圆脸人，那个庄严面孔的大学校长……他们那般人这时候不是在高等俱乐部里玩牌喝酒，就是舒服地躺在家里睡觉！

他愤怒地用他那只肥大的手抓头发，他发狂似地自言

自语：

“我明天就要求在这个囚房里装一个电台！我要把我的事情宣布到全世界去！”

二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是查理斯顿监狱最热闹的一天。小孩的歌声和笑声在这一天是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人群的吵闹和汽车的喇叭。许多武装警察守在监狱的门口，许多男女工人徘徊在监狱的门口。这个监狱自从一八〇五年建筑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人注意的。两个意大利工人坐电椅成了麻省的一件大事情。像这样的大事情麻省还有过一次，就是在撒冷地方烧死女巫。那是一六九二年的事，那个时候北美合众国还没有成立。

在这天下午七点钟光景鲁意加进监狱来向她的哥哥告别，这一天她已经进过监狱三次了，都是同罗沙一道来的。罗沙来看她的丈夫尼克，而且带了她的儿女来跟他们的父亲见最后的一面。

跟自己亲爱的人诀别，这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这个南欧乡村的姑娘到这儿还不到三天。在这三天里她跟她哥哥巴尔托谈话，一共谈不上三个钟头，这就是分别了十九年以后他们兄妹唯一的谈话的机会了。

这诀别的一幕是很悲惨的。巴尔托从妹妹的面容上知道她已经为他用尽了力，但是希望完全消失了。铁格子门把他

们分隔开了。她把手伸进铁格子去抱他，他也把他的手伸出来。他也知道这是他们兄妹最后的拥抱了。

“哥哥，亲爱的，你祷告上帝呀！他会救你的灵魂的。”妹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第一次出门就单身远渡大西洋，全靠了爱和信仰。她爱哥哥，她信上帝。她哭起来了，再说不出一句话。在她，只有上帝才是最伟大的裁判者。除了救灵魂的话，她找不出第二句话来安慰哥哥。

上帝救灵魂，这是一句什么话！难道在这时候他还会像小孩那样地去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吗？他想着，他要苦笑。

“妹妹，不要哭，死并不是可悲的。而且每个人都要死。”他吻她的前额，这样地安慰她。他想，是的，每个人都要死的。老法官、省长、大学校长，以及别的许多人都会死的。那又有什么差别呢？

但是为什么他应该比他们先死呢？为什么又必须让他们把他送到电椅上去烧死呢？这一想，他又愤怒了。愤怒和悲痛混在一起。看见妹妹哭，他感到悲痛。跟妹妹分别，他感到悲痛。这妹妹在他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女孩，如今快成了一个中年妇人了。她现在孤零零地从海洋那边来，又会带着他的尸首孤零零地回到海洋那边去。

“哥哥，你吻十字架罢，它会使你的灵魂平安的。我回去会替你祷告。”妹妹止了悲哭，拿起挂在胸前的十字架要哥哥吻它。她只担心他的灵魂会不会得救，却想不到明天就有人拿她的哥哥比耶稣·基督。

“妹妹，你忘记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忘记我是因为什么

缘故才上电椅的吗？不要替我祷告。你回去，而且你将来回到海洋那边去，你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所有的人，你要说我是无罪被处死刑的！”巴尔托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等一会儿牧师来为他祷告叫他忏悔的时候，他会拒绝。

他记起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想到它，他觉得高兴。

“妹妹，我今天早晨接到一封从非洲来的信。那个写信的退伍兵说他愿意替我死。”他微微地笑了。

鲁意加听见这句话又哭起来。

“为什么老是这样哭？你还担心我的灵魂不会得救吗？你忘掉那件事罢。你要勇敢些。你知道我是无罪的人！……啊，你还记得十九年前我离家时候你抱住我的腿哀哭的情景吗？你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如今你长得这么大了。你居然单身越过海洋来看我了……”

“我还要去见省长，我要去哀求他，哀求他宽赦你，”她哭着说，她下了决心了。

“宽赦？为什么去求他宽赦呢？我本来是无罪的人啊！”他还在辩驳。

但是会见的时间完了。在隔壁囚房里尼克跟妻子诀别的一幕也是很悲惨的。

送走了妹妹，巴尔托一个人留在囚房里。他冷静地在里面走来走去。他的心还在痛，但是他的心已经比在前两天平静多了。他如今在思索。

他在思索些什么呢？他在思索死是怎样地可怕吗？他在思索电椅是怎样构造的吗？他在思索那般人在怎样地准备血宴吗？不，他在思念他的那些朋友。

他在思念他的妹妹和父亲。他在思念他的南欧的故乡。他在思念遍于全世界的援救他的运动。

他如今已经走到生命的边沿了。他思索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了。他很明白，他不能够把他最后的思想让那些可诅咒的东西占据了去。他不能够把他的最后的思想放在诅咒上面，在前几天里他已经诅咒够那般可诅咒的东西了。现在他要来爱，要来祝福那般援救他、热爱他、同情他的人。他要把他所能支配的有限的几个小时完全用来思念那般人。

爱，他是为了爱而死的。他要让这个字永远刻在他的心上。他对那般人的爱是更伟大的，他不能够让对另一般人的憎恨把他的心占据了去。

法官，省长，大学校长……他们算得什么呢？他们会比他更懂得爱吗？将来他们死的时候，也会像他这样引起千千万万人的同情和悲伤、援救和骚动吗？

钟声当当地响了。报告着十二点钟。

时间怎么过得这样快！他跟妹妹诀别后还不到多久。他也没有思索了多久。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思索了。

生命是多么可爱的呀！……他想，这或者只是一场梦吗？牧师来了，装出慈祥的面孔。狱卒打开了铁格子门。

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就像死的黑影，来给他报告死的消息。

“孩子——”牧师用说教的调子说起来。

他为什么要听牧师的说教呢？他有什么忏悔的话向牧师诉说吗？

祷告……赎罪……这慈祥的面孔正是掩饰罪恶和不义的虚伪的面孔啊！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马上把牧师的嘴堵住了。

电椅同牧师连结在一起，这就是基督教的文明罢了。他望着牧师的背影，心里这样想。

在外面响起了许多人的脚步声。有一个人的脚步是他很熟悉的，这是尼克，他的同伴尼克！

尼克被带去坐电椅了。他的心猛烈地抖起来。罗沙、但丁这两个名字同时在他的耳边响着，是他自己在呼唤。罗沙，那个可爱的小女人。完结了，七年来的希望都消散了。

他的轮值马上就会到的。刚这样想，他就被人带出囚房去了。

狱卒握着他的一只手，但是他挣脱了。他自己可以走去。他并不害怕。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走不到二十多步，他就进了刑场，就是那个放电椅的厅堂！

尼克的尸首已经不见了。他想一定是在屏风后面。他看见一面大屏风，显然地屏风后面有着不寻常的东西。

电椅，黄色的金属的椅子庄严地摆在厅堂上，就像一个宝座，这就是近代科学的大发明，它会取去一个人的生命。还有

那顶盔一般的铜帽，它果然能够取去他的全部思想吗？

他用轻蔑的眼光把电椅看了一下。他慢慢地向着它走去。忽然几个月以前他对那个老法官说过的一段话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了：

如果不是为了这些，那么我就会在街头巷角谈闲话笑骂人，这样地过一辈子。我也会死亡，不被人知道，白白地活了一生。现在我们并不是白活的了。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一生决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宽容、正义和人们互相了解的事，像现在我们因为这偶然的事情做出来的。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痛苦——算得什么！而杀害我们的生命，杀害一个好鞋匠和一个穷鱼贩子的生命——那就是一切了！最后的时刻是属于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胜利！

这段话忽然很清晰地来到他的脑子里，就像刻印在那上面一样。

他觉得他已经明白一切了，他觉得他的激情完全消失了。他现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死。他说得不错：痛苦就是他的胜利，死就是他的胜利。

他冷静地、坚定地向着电椅走去，没有畏惧，也没有留恋，就像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再会罢，先生，”狱吏温和地说，对他伸出了手。奇怪，那个中年人的眼睛里有泪珠在发亮。这对眼睛悲戚地、无助地望着他的冷静的脸，好像在说：“原谅我罢，我是不得已而做

的呀！”

他温和地微笑了。他明白这个中年人不过是一副大机器里面的小小零件！他扮演着不重要的角色，他是被动的东西，自己没有方向，只是跟着别人动。他巴尔托为什么要恨他呢？他觉得这个中年人实在可怜。

他就伸出手把那个人的手紧紧地握住。他微笑地说：“谢谢你，我感谢你为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情。”

是的，他感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这一向的确好好地照料过他。

他看见，他觉得那个人的眼泪滴在他的手上了。他就甩开那个人的手到电椅上坐下去。

他坐在电椅上，两只手就放在两边的靠手上面。他想，这样的椅子怎么会是人坐的呢！但是人家马上动手把他的两只腿紧紧地夹在铗子面了。接着人家又把他的腰也束起来。

说话，现在是应该他说最后的话的时候了。说呀！

他平静地抬起眼光望前面。正对着他放了三把椅子，坐着三个人：一个特许的新闻记者，一个监刑的医生，一个狱吏。

他先看医生。监刑用医生，这也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大发明罢。他又看狱吏，为什么还要看他呢？他最后看新闻记者，这个人出去会告诉全世界他所说的最后的话。这个唯一的新闻记者会把他的呼声传达给所有的人。他要对他讲几句话。

“诸位先生，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自然有时我也不免有小小的过失……”（“为什么我要对他们说这句话？他们是不配了解我的过失的。他们的过失

一定比我的多得多!”)“……我什么罪都没有犯过,不仅没有犯过别人诬我的罪,便是一切别的罪恶我也没有犯过……”他这样说,他要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要全世界都相信他不曾杀过人、抢过钱。

这些话太软弱了。金圆国家的人是不会注意的。那个大学校长罗威尔先生听见不会哂笑吗?那个猴子脸的法官和圆脸的省长听见不会拍手称快吗?这不行!他到死还在说温和的话。他应该说几句使得那般人战栗、震恐的话呀!

他于是把憎恨的眼光向四面看,这时候在他的心里憎和爱正在激斗。他的心又抖起来了。

他无意间触到狱吏的眼光,然后又触到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狱卒的眼光。他们都像在哀求:原谅我们罢,为什么要恨我们呢?我们都是不得已而做的呢!

他的脸上现出了苦笑。他低声说了一句:“我愿意宽恕那些现在这样处置我的人。”

他说这句话显然费了很大的力气。过去七年中的痛苦压迫着他。现在到了这最后的一刻,还要他宽恕,还要他忘记!他已经贡献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牺牲了。现在要他连憎恨也牺牲掉,这未免太过份了。他不能够!……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痉挛。

他觉得他还应该说几句表示他的憎恨的话。他应该说几句关于他的惨痛的历史的话。他刚张开嘴,但是人家就把铜帽笼在他的头上。人家不许他再说话了。

死!这一个字打在他的头上。

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他的身子开始麻木，整个身子就像火在烧，尤其是那颗心。他嘘了两口气，身子微微地颤抖，接着又挣扎了一下，于是他不动了。

一共只有六分钟。就是这样地迅速！这个近代科学的发明！

三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报纸上自然刊载了许多关于它的文章。纽约《民族周刊》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麻沙秋谢省，凶手。”

纽约《世界周报》的记者却写着：“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培养刽子手的地方了。”

另一份日报上印出了纽约城的自由神铜像的速写，这个自由神的右手握的不是火炬，却是一把短刀。

1932年。

呈献给“吾师”凡宰特(代序)

许多时候以来就想呈献给你的东西，到现在才预备好，但是你那曾经写出使得千千万万的人流过泪的文章的手已化成灰烬，它们不能够摩抚这本小书了。这一双肥大的手非但不曾流过任何人的血，抢过任何人的钱；而且它们还十分慷慨地把你自己的心，自己的血挖了出来，倾了出来，平等地分给所有的人。可是人们因为不能够报答你的恩惠，便把你送上了电椅。二十世纪中两个最好的人就这样地灭亡了。

人本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古今来多少有利于同胞的人大都不见容于同类而得着悲惨的命运，何况你们这两个“无名小卒”“卑贱的工人”，所以你们只有死了。

你在电椅上，在最后的瞬间，还像神话上的耶稣那样高呼“宽恕”。我知道在你的那一颗爱字铸成的心中是没有“憎”和“报复”存在的。然而我却常常犯了罪了，因为我违背了你的教训去宣传憎，宣传报复。

据说在你临命前的一月中我也曾给了你一个深的影晌。然而现在我要跪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宽恕了。吾师啊，原谅我，我是不能爱人的，我是不能宽恕人的，我所要宣传的不是宽恕而是报复。至少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

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

献给你这一本书,几年来我的血和泪都在这里面了。吾师,请了解我。

六 死囚牢中的六年

萨珂(Sacco)与凡宰特(Vanzetti)果然会被杀么？

一 杀人的政府

要说政府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怪物，恐怕谁也不会相信罢。你看，有两个人，他们的死刑全世界各处无数的人大声反对，全世界无论欧洲、美洲、亚洲的重要都市里都成立起来了援救他们的委员会。无论是知识阶级或劳工阶级，无论是无政府党、共产党、社会党都同声一致地反对政府杀这两个人；全世界中凡有良心的人都一致地要援救这两个人，他们与政府奋斗了六年了，然而美国麻沙秋谢州(Massachusetts)政府仍然要杀这两个人。难道这许多万人的意志还敌不上那几个人人的意志么？在一八八七年美国伊立诺伊州政府已违反了许多万人的意志冤枉杀了五个人了，现在，在同样的情形之下，那两个人也许会有那同样的命运。然而我们能眼见着政府随意杀我们的同胞么？我们要援救他们，而政府却要杀他们。从此我们也许更了解政府的性质是完全于我们有害的了。我不仅要救我们现在被难的兄弟，也要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子孙，

那么我们非把那杀人不眨眼的怪物除掉不可。

那两个待死的人便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珂与凡宰特。

二 萨珂与凡宰特

萨珂与凡宰特都是意大利人，无政府主义的斗士，最近十年间他们在美国新英格兰一带从事劳动运动甚力。他们本来是工人，所以能纠合工友们组织工会，时与资本家抵抗，遇有罢工运动，他们总是尽力援助，因此便得罪了资本家。资本家把他们当作最厉害的敌人，时时想法陷害他们。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麻沙秋谢州南布兰垂某制靴工厂的守卫和会计被强盗杀死了。这件事本和萨珂与凡宰特毫无关系的，然而法庭会想办法。

萨珂与凡宰特的被捕日期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他们被捕的真正原因与杀人事件并无关系。原来政府另有别的用意，是年五月三日在纽约城内有一个行人在早晨看见从警察署的十四层高楼窗子里抛出一个人的身体，这个人究竟是跌下来的，或是被人谋害后把尸体抛下的，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塞多(Salsedo)。萨珂与凡宰特对于这件事异常痛恨。他们是萨尔塞多的亲密的同志和友人，在萨尔塞多被捕后未死之前，他们极力奔走运动援救他出狱，谁知正在这运动激烈的时候，他们所要援救的同志竟被人谋害了。这种绝望的悲哀与愤怒使他们不得不从事于激

烈的抗议运动，猛烈的攻击政府当局，他们预备好了开一个群众大会，散布了许多传单，但五月五日他们便被捕了，身边还有一张传单。

在被捕后的前几天，州政府只说他们是过激分子，预备把他们驱逐出境，然而法律上的理由又不充足，于是警察们便极力搜求可以做诉讼理由的证据。最后这些走狗们终于“发明”了很好的办法。政府当局轻易地把靴厂守卫和会计的被杀事件的责任放在这两个“过激分子”的头上，这真是绝大的发明！

三 儿戏的审判

说审判是儿戏，也许那些拥护法律的人不肯承认，然而事实上使我们相信如此。你想想看，那些人，他们的人格甚至比一个强盗还坏，他们居然敢来审判那些为正义人道奋斗的革命家，真太不自量了。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还不以合法的手段来审判，他们还收买了许多伪证来诬陷被告。譬如一八八六年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审判开始时，法官便受了贿赂枉法裁判，于是以莫须有的证据判了五个人的死刑。后来新任伊立诺伊州的州长，才把那件法官受贿的事宣布出来。从此法庭受贿的事尽人皆知；“审判是儿戏”的话谁都承认了，只苦了那呻吟于法律下的冤魂！萨珂与凡宰特的事不过是许多不公道的审判中的一件而已（其实审判不会是公道的）。

法庭方面既把一切的手续预备好了，于是开庭审判。许

多无聊的人都被收买来做证人，在法庭上胡乱说了一阵。这样的审判继续了七个星期，都不过是玩的同样把戏。那十二个陪审官照例是玩把戏的好手，还有那州律师和裁判官等，也都是上等的刽子手。所以审判的结果便是死刑。

说来是很奇怪的，法庭方面在开始审判的时候，把萨珂当成制靴工厂事件的主犯，凡宰特算是在布立奇渥达十二月二十四日另一强盗杀人事件的凶手。其实这隔了许久的事居然会连在一起，真正是儿戏的举动了。

关于凡宰特的公诉是秘密进行的：出乎一般想象以外的不公平。先判了凡宰特十五年的监禁。凡宰特为着准备再审判的缘故请求缴纳保证金，保释出狱，但法庭又以与制靴工厂事件有关拒绝保释。这种举动更足以使人明白法律的性质，实在说来更足以使人轻视法律。法官可以随意收买伪证，来把许久未决的旧案的责任放在他们所欲杀死的人的头上，法律只不过是他们杀人的工具罢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萨珂与凡宰特自然会得着死刑的判决。果然在第七星期的审判后，麻沙秋谢州法庭便判决了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虽然这“电椅的死刑”比较杀头绞首要文明一点，然而一想到这次审判的内幕，便令人不寒而栗，这何尝不是最野蛮的举动呢？

四 法庭的重重黑幕

法庭是公正的么？不，绝不！两个曾服务于联邦政府的

警察署职员奈若尔满和卫羊特说，萨珂与凡宰特是帕尔麦和警察署员弗林等在一九二〇——二一年组织的渴血的阴谋之下的两个受害者。而先前死的萨尔塞多也是一个受害人。他们的阴谋是反对一般革命党——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既杀了萨尔塞多之后，又要来杀萨珂与凡宰特了。

奈若尔满又说，波士顿的联邦警察署员都以为萨珂与凡宰特实在是和他们所被定的罪名无关的。

波士顿巡回法庭庭长安德生甚至在萨尔塞多被害以前，便严厉地攻击帕尔麦、弗林等所组织的陷害无政府主义者的“赤十字军”的法西斯蒂行动，萨尔塞多的被害应由帕尔麦负责，因他当时是被帕尔麦囚禁起来的。那些刽子手要叫他供出同志的姓名来，还预备把一九一九年六月的炸弹事件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后来大概是因为这种手段失败了罢，便率性把他害死了。

这样可见萨珂与凡宰特的判决完全是法庭做好的圈套，什么证据都是假造的。法庭的重重黑幕这次算揭起了一幕，看呀！那里面是何等黑暗，阴郁！何等的可怕！法律，在你的名义之下，不知有若干无辜的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了！

然而有许多人还想政府和法庭有一点公道的处置，还希望那杀人眨眼的刽子手会有一些良心，他们请求再审，但经过了许久的努力后，所得到的是麻沙秋谢州最高法庭的拒绝！要是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萨珂与凡宰特的罪，为什么又怕再审呢？

五 真正凶手马德诺司的自白

一九二六年夏，一个杀了银行会计的凶手马德诺司(Ma-deiros)，在法庭上自承他和几个同伴是一九二〇年制靴工厂谋杀事件的凶手，这完全和萨珂与凡宰特无关的。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假若根据这证据审一次，那么萨珂与凡宰特的罪名一定可以洗刷干净。然而法庭方而把这重要的证据一笔抹杀了。

裁判员赛叶(Thayer)对于再审的请求，驳覆道：“以马德诺司的供词而论，法庭可以很轻易的把责任移在别一些陪审官的身上，然而果真要这样做，便无异乎规避法律所加于法庭的严重职责了。我为这严重的职责所驱使，不得不费了几星期的时间，不间断地来考验和研究关于请求再审的证据和马德诺司口供的记录。我凭着理性和良心的判断，而且存着对于被告方面的怜悯心(这怜悯心是在不与法律的原理和对于公家权利的尊重二者相冲突的范围内的)结果，我不得不判断马德诺司的口供是不可靠的，不值得相信的，虚伪的。要根据这样一篇供词便把这国里最高法庭所承认的十二个陪审官的判决推翻，这简直是在侮慢真理和正义了。因此我使用法律所赋予法庭允许请求再审的一切权利，拒绝这次对于再审的请求。”

这样以极无理的理由就把马德诺司的口供一笔抹杀，对于请求再审的希望作了这样一个严厉的打击。萨珂与凡宰特

是一定要死的了。然而他们的死刑，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杀人的嫌疑，而是因为他们劳动的主动者，是政府所痛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真正罪名不是杀人而是保护工人的利益。

于此可见世界上最卑鄙的莫过于政府的走狗了。他们不敢明明白白的杀人，而必假造一点罪名加在别人身上作藉口以杀之。芝加哥的悲剧已判定了伊立诺伊州法庭的死刑，而马德诺司的自白又判定了麻沙秋谢州法庭的死刑。现在不是法庭在审判被告，而是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在审判法庭的日子了。总有一天人们的愤怒堆积到无可隐忍的时候，他们会起来像捣毁法国巴斯底监狱一样，把一切的法庭捣毁得干干净净，不留一块石子在地上。

六 凡宰特的身世

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在他的自叙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里，用很动人的笔叙述他的劳工的生活。他在十三岁的时候，便开始在一个意大利城里的糕饼店里工作，一直作到他来到美国的时期。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他便同萨珂一齐被捕了。他的全生活里都是勤勉刻苦的劳动的日子。到美国后常常有失业的时候，连面包也不能得一饱。在意大利时，他很少读书，到了美国后，不管生活如何困苦，他仍努力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思想。他读过克鲁泡特金、马拉铁斯达、邵可侣、马克思、马志尼、斯宾塞、达尔文、

托尔斯泰、左拉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书籍。他承认他的思想力还不足透彻了解这些材料。他说：“但是我又研究对于人们、动物、植物以及人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之残酷的继续的严厉的观察。生活的书：这是书中之书！所有其他的书都不过是教人怎样去读那本生活的书罢了。”最后说到他现在的情形，他说：“我在众人的自由中去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以为要建立一个正当的人类社会，唯一的道德的基础便是义务、权利、事实的平等，只有在这基础上，正当的人类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

这便是那个人，美国警察为着要保护他们的主人（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缘故，不惜收买伪证来诬陷他，用种种手段来谋杀他。然而就不管马德诺司的自白，你会相信写《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的凡宰特会做一个强盗杀人犯么？

七 监狱中的萨珂与凡宰特

最近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波尔基(A. Borghi)曾到监狱里看过一次萨珂与凡宰特，出来后，记录当时的情形如下。

我到他们的监狱里去看他们。进去时我不禁战栗，出来时我竟哭起来了。

啊，同志们！他们在那里很活泼，很康健。他们微笑着。他们谈论着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奋斗，好像他们在几星期后就要出狱似的。假若你不常见他们，你定会忘记

他们现在的实在情形了。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如此清明，面貌是如此安静，精神是如此平静。

然而实际上他们却被判定死刑了。

在监狱里，就在凡宰特被囚的地方，那可怕的杀人的电气刑具已设备起很久了。因此我们的同志每天早晨当他的囚室门上的锁打开的时候，他不知道究竟是狱卒领他出去照例的散步呢，还是上那电气死刑台。

凡宰特自己对我讲，有些时候，有人把他放在那个离执行死刑的地方很近的囚室里。他能够听见那伴随着刑具起来的可怕叫声。

我出来时自己心里异常的激动。我希望这是一场幻梦；我想象到那等候着这两个被资产阶级所拘押的人质的可怕的最后，国际无产阶级看着资产阶级把他们放在刽子手的手里而不能阻止。我想到这个，我感觉很大的羞愧！

这样，经过了七年的抗议后，对于这两个被定罪的同志已是七年的殉道了。

他们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们以一种激动的确信的态度向你们明白的宣言：“电椅的刑罚迟早总会来的，早一点还要好一点。”

萨珂在一阵愤怒的时候，他的南意大利人的黑眼睛为愤激的火焰燃起来了，他叫道：“我不再签名请求再审了。不管怎么样，这是应该早点完结的。”

我向这两个英勇的同志说，现在法国援救他们的运

动扩大了，这是法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特别是在巴黎的）的工作。

他们都知道。他们感谢同志们，然而我再说一遍，他们相信是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不管这个，他们现在的精神仍是惊人的。

七年！……判决了死刑后的六年。

这七年之中，萨珂过了七年囚室里单调寂寞的生活，凡宰特做了七年的苦工。而且时时来到脑里的思想就是死。

今天？明天？后天？

他们是无罪的。便是他们的精神的坚忍力量已足以证明他们是无罪的了。

要是在明天，这两个殉道者在绝望的时候，承认是罪人一死了事，那些科学家、法学家能够不想想近代所用攻击中世纪的惨酷刑罚的论辩便来承认这种自白么？

一个人生活在电气死刑的威吓下过了许多年，每天早晨狱卒来开囚室门时，都有牵出去执行死刑的恐怖，这样的刑罚，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残酷的么？

怎么做呢？

第一，我们应尽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敌人没有机会做事。

第二，应使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运动到处蜂起，像现在才开始那样。

我们且假定萨珂、凡宰特还有生存的希望，而你们和

劳动阶级援救他们的奋斗也是会得着胜利的。

八 我不是一个罪人

美国名小说家派苏司(J. D. Passos)曾到监狱去访过凡宰特一次。

凡宰特坐在一个凳子上，身体粗大，平静。在他的广阔的眉下有一对安静的眼光。他有浓密的髭须，当他微笑时嘴唇并不抖动。

我们互相问候了过后，凡宰特说：“很不好。我应该勤苦地工作，现在应该更勤苦了。我要写的东西太多，而且恐怕又没有好多时间了。”

他每天差不多有三小时的时间来读报、写信、作文。其余的时间便在工厂里作汽车的铁板。

他又说：“在监狱里写东西很困难。以前我每天可以劳动九小时或十一小时，然后坐下来写东西。……在我的文章里少有错的地方。然而现在呢，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改，在囚室里写东西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又谈到教士。天主教教士和新教的牧师都发表宣言和文章来攻击他。他们说，别的囚犯看见这个判定了死刑的罪人居然会这样一年一年地逃掉刑罚，那么他们便会变坏的。

“他们之所以恨我，不过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罢了。假若我肯走到他们那里去，向他们谦卑地说：‘神父

‘啊，我现在忏悔了，请你赦免我罢！’他们便会帮助我的。”凡宰特这样说。

“最后，我请求见木尔飞神父。我要求见他，向他说，‘我对你曾做了什么事会使你这样的反对我呢？’他战栗得像一片树叶，除了温和甜蜜的话语外什么也不说了。要是我果真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救我的灵魂，也许甚至红衣主教也要替我说情的。他们恨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罪人。”

在监狱中，你一入了法律的陷阱，你的最大罪名便是“无罪”了。

凡宰特说：“请告诉他们说，我拒绝一切宽恕减刑等等的请求。我既然是无罪的了，为什么要去要求减刑呢？”他说话的时候是很安静的，声音一点也不抖。

九 全世界同声援救

判决是定了，再审也不能了，一切都完了。这种残酷的判决自然会引起有良心的人的反对。自一九二一年判决以来，世界各处都有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运动。在波士顿组织了一个“萨珂与凡宰特援救会”，一面宣布法庭的黑幕，一面向全世界报告此事的真相，请求有良心者的援手。已故法国著名文学家法朗士当时还健在，他在那年十月三十一日致书英国国民全体，敬请援救两人，言词甚为沉痛。近来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也宣言反对这两人的死刑。在法国这种运动异常激烈。不仅无政府党要援救他们的同志，便是共产党、社会党、急进党

等等都要救这两个无辜被害的人。所有大的报纸论到此事，无不反对美国政府的措置。“国际无政府主义者援救会”在法国各大城市组织演讲会，演说的人有该城的市长以及著名人物，工团亦有人参加演讲，著名文学家乔治·比阿席(G. Pioch)每次都以其的如火的辩才把这次残酷不公道的事件展示于全法国人民之前，叫他们救救他们的无罪而被处刑的弟兄。

此外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英国、日本等国都有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抗议书致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在法西斯蒂势力下的意大利，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和共产党联名发出抗议书。在南美布威洛士，有人在美国公使馆投炸弹示威。

至于美国，各地的反抗运动更为激烈。在纽约，自去年十一月以来由 I.W.W. 发起，连日在马秋生司克亚公园开抗议大会，每次到会者有一万八千余人。许多演说家的热烈辩才感动了无数的人。有名的辩护士泰罗说，“假若尽力如此做去，便可以保证有再审的可能和生命的救助。”I.W.W. 与其他劳动团体组织“国际劳动者防护委员会”，屡次向麻沙秋谢州州长提出严重的抗议书。

全美国劳动团体的机关报上一致登出下面的口号：

从合法的杀人者手里救出萨珂与凡宰特来！

不要让这两个同志死了！

以相互扶助之键打开这两人监房之锁，把他们救出到自由的世界来！

至于资产阶级呢，这次他们也要说几句公道的话了。美

国各资产阶级的报纸也反对法庭的判决。《波士顿消息》上说：

萨珂与凡宰特不应照一九二一年的判决施刑。我们对于这两个人的政治理想并不同情，然而我们的怀疑渐渐使我们确信这两个人是无罪的。再审的请求是根据警察吏奈若尔满与卫羊特二人的供词以及马德诺司的口供的。关于前两个人，裁判员赛叶说他们故意使他们的供词带有侵害美国政府的威权的性质，至于马德诺司，他说这是一个卑鄙的骗子。

我们要求考察奈若尔满与卫羊特所指出文件中关于这案件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忘记萨珂与凡宰特是在压迫革命党人最厉害的时期里被定罪的。而且警察长帕尔麦在一九二〇年纽约监狱中的悲剧里所做的事也很可疑，在其间萨尔塞多在拘留所的十四层楼上坠下死了。

因为这些理由，我们希望在一九二七年的安静的空气里重审这案件。

今年四月十二日法国社会党的报纸《每日新闻》(Quotidien)上也说：

据可靠的消息，萨珂与凡宰特将于今年七月十日后的一星期里被执行死刑了，恰恰距现在还有三个月。……我们想象中会看见那被定罪的人缚在那杀人的电椅上，然后放下来抬回监狱，过几天便行葬礼了。这所经过的一切可算是最残酷的举动了。

难道那一大群智慧科学进步的人能冷淡的看着这两

个人受这样的苦刑么？

他们是无罪的！

罗曼·罗兰等也致电美国政府抗议他们的死刑：

法西斯主义及白色恐怖下受害者防护委员会抗议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要求释放他们。

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爱因斯坦。

我们很苦痛地知道麻沙秋谢州律师要求立刻执行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

这两个人，千万个有良心的人都说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在一九二一年被判死刑后等候那最高法庭的决定已六年了，他们长期的殉道已唤醒我们国人的一致的同情。

我们诉之于美国政府的仁慈，希望以公平的宽恕手段对待他们。

盖约(前国务总理)

麦拉尔杜连六人(万国人权协会会长)

巴齐(法国人权协会会长)

茹阿(法国劳动总同盟书记)

此外塞威林(Severine)及比阿席、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二十六人联名致抗议书于美国政府，署名的人都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和学术界有名望的人。其余向美国政府抗议的人不知多少，其他各国抗议这种判决的人更不计其数。意大利政府也向美国政府提起交涉，这些事因篇幅关系也不必多说了。

一〇 劳动阶级的愤怒

全世界的工人们看见他们的伙伴快被美国政府诬杀，自然异常愤怒。政府本来是工人的仇敌，对于敌人只有奋斗到底，更何况此时他们的伙伴又陷在敌人手里呢？

美国政府要诬杀萨珂与凡宰特，便无异正式向工人宣战，工人也只有准备应战的。

柏林革命工团主义的工人国际（第四国际）发出沉痛的檄文，告全世界的劳动阶级，要全世界的工人们一致起来援助他们在危难中的两个同胞。

法国劳动总同盟致美国劳工同盟表示法国工人的态度与美国工人一致。坚决的反对萨珂与凡宰特死刑。同时又电安士潭工团社会主义国际，要求一致反对美国麻沙秋谢州政府的野蛮举动。

安士潭社会主义国际同时致电麻沙秋谢州政府，代表七百万工人表示萨珂与凡宰特的无罪，并反对他们的死刑。

南美阿根廷的布威诺亚列司（Buenos-Ayres）地方的码头工人罢工四十八小时，表示他们的反对。

纽约的工人在最高法院的决定宣布后，四月十一日也罢工一小时，十四日在联合广场举行了示威运动，并且还要开会决定总同盟罢工的日期。

—— 最后的一步

虽然全世界中有这么多的人要救这两个人，然而那些滴血的恶魔却一定要杀他们。诺尔福克郡地方律师威尔巴说：“我相信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执行期愈速，则现在的种种运动之消灭期愈早。要是我们早把电气死刑执行了，那么决不像西布立奇渥达炸弹那样的事发生了。”

这样说来，可见支配阶级是决心要杀萨珂与凡宰特的了。

今年四月五日午后十一点十五分钟，“萨珂与凡宰特援救委员会”从波士顿发出下面的电报：

最后的一步，——电椅——情形很悲惨。

第二天法国各报都载出来，加以沉痛的评语。

果然，四月九日便宣告最后的决定了。情形是这样的，在裁判官赛叶未到之前，州律师连奈把法庭的决定告诉了辩护士汤姆孙。

萨珂与凡宰特知道他们还有九十二天可以活的了。

不久宣判的仪式便开始了，书记起立宣誓，并问：“尼古拉·萨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萨珂便立了起来，先抱歉说他的英语不好，请原谅，然后演说道：

“我从不知道也从不曾听说过，更不曾在历史上读过世间还有和这个法庭的残酷相等的东西。

“你们经过七年的迫害后，所宣告的判决，是阶级的判决，是有产阶级反对被压迫阶级的判决。只要这两个阶级存在一日，他们便会冲突一日。我们是和你们所压迫的平民一起的。我们要谋他们的解放，而你们却故意煽起各国平民间的恶感，在他们之中筑起一道鸿沟。

“裁判官赛叶，你知道我生涯中的一切，你完全明白为什么我的妻子和我受着压迫者的迫害，在那些压迫者中，你自己也就是一个。你也知道这个人^①生涯的详情，他一生永久为弱者谋幸福，但是你虽知道他是无辜的，你却两次判决了他的死刑。

“你忘记了那绝大的群众，他们七年来用尽了精力和仁爱来阻止你对于我们的野蛮的判决。我感谢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这是有良心的人，普通的人。他们主张正义。然而你却不顾他们，残酷无情地定要贯彻你的目的。你的意思不过就是这样，什么正义，什么人道，你们何尝顾虑到丝毫！我用不着再向你说什么了。

“不！我忘记了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件事。裁判官赛叶，你明白我生涯中的一切，你深知我永不会是罪人：不但昨天，今天，而且永远我都不是罪人。”

书记又问凡宰特有什么话要说。

凡宰特答应了一声“是”，便立了起来。他演说了四十二分钟，猛烈地攻击法庭，攻击裁判官赛叶以及他所代表的秩序。

^① 这个人：指凡宰特。

“我坚持我的宣言，我不但不曾犯南布兰垂的罪案而且也
和布立奇渥达事件无关。我不但与这两件事无关，而且我
一生从来不曾杀过一个人，或偷过什么东西，我也永远没有流
过别人的血，并且我一生中都是在为着消灭人类生活中的罪
恶而奋斗的。

“谁知道我这一双手，便会明白我绝对不会在街上抢劫别
人的金钱。……

“我能够不劳动而生活，然而我自己拒绝了这种社会中良
好地位的引诱和荣誉，因为我以为要靠他人的劳力而生活，
这是不公道的事。

“我不仅反对那种法律那种道德所判定的犯罪，我还反对
这法律道德所承认所尊重的人，对于人的管治和掠夺；因为这
个理由（假若能够叫这做理由的话）便使我今天在这罪人席上
受判决，而且在几分钟内便能被屠杀的。真实的理由除了这
个外什么也没有了。

“你知道我们已被监禁了七年。我们所受的痛苦是不能
描写出来的，然而你可以看见我今天向你说话，一点畏惧也没
有，我看着你脸一点也不红；没有什么羞愧，没有什么畏惧，会
使我改变颜色的。

“我们是反对战争的，近十年来的教训使我们仍是这样地
反对战争。我们永远相信战争是一场灾祸。我们永久是战争
的敌人。假若在这里我能够向人们说：‘小心罢，你们正走向
那人类中许多良好分子的墓地去咧！为什么呢？所有别人向
你们说的，允许你们的，都是谎话和幻想。他们允许了你们的

自由，自由在哪里？他们允许了你们的幸福，你们果然享受到么？他们允许你们道德的提高。但这道德的提高又在哪里？’假若我们能向人们说这些话，我便很快乐地去受死刑。

“我的最后的话是这样：我决不愿意一只狗一条蛇或一个地上最可怜的生物有一天会受我这样的苦，无辜而受刑罚。

“然而我相信我受苦的真正原因我自己是要负责的。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实在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意大利人，实在我是一个意大利人。

“我为我的家族以及我亲爱的人受苦更甚于为自己受苦。

“然而我是如此坚决的相信，纵然你裁判了我两次，或者纵然我有再生的希望，我仍然像以前那样把生命贡献与主义，走着与从前同样的路。

“我的话完了。谢谢你。”

凡宰特的演说感动了旁听的人。大多数人都哭起来了。全法庭静默了几分钟。检察官不说什么。裁判员赛叶也不开口。最后赛叶起立向着被告席宣读判词：

“被告等应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受电气死刑。”^①

萨珂叫道：“我们是无罪的啊！”

赛叶说完，也没有勇气照例地说那“仁慈无限的上帝会怜悯你们的灵魂”的话了。他投了一瞥骄傲胜利的眼光在不幸的两个被告身上，便匆匆进去了。大概这个时候他会打电话

^① 这里是译意。

到他家里报告他的胜利罢！

一二 勿忘七月十日

在经过激烈的援救运动后，得到这样的结果，人们的愤怒自然到了极点。在美国总同盟罢工的筹备已快妥当，在最近的将来就要爆发的。在法国已由各党派联合起来组织萨珂与凡宰特委员会。就以巴黎一地来说，隔了几天便开一次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大会，在街上到处可看见很大的招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也很活动，“无政府共产主义联合会”的机关报《自由人》每期特辟一栏登载此项稿件。“萨珂与凡宰特援救委员会”（法国的）发出签名表四万份，每份可容一百七十五个人的名字，总共可容七百万人的签名。此项签名表由《晚报》及《自由人》两报分散。签名期自五月八日开始，六月十九日截止。预计至少可得五百万人签名，于六月十九日送到美国公使馆。巴黎的《晚报》自四月二十六日起每天登出很多签名人的姓名和地址，而且签名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这可见援救萨珂与凡宰特的事已不仅是无政府主义单独的，而是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共同的事了；同时可证明萨珂与凡宰特的判罪全是冤枉的。

七月十日快要到了。萨珂与凡宰特也许会死，然而我们能眼看着他们去坐电椅么？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无罪的。难道我们能眼看着他们受着杀人强盗犯的罪名而被害么？假若我们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假若我们还有一点人性，假若我们知

道正义、人道是什么，那么我们不能——绝对不能——眼看着，亲眼看着这两个无辜的人，甚至就在现社会中也算是人格极高尚的人，毫无证据地被人诬告，被人判罪，甚至就要被人送上电气死刑台。我们要起来，要起来救他们，也就是救我们自己。假若我们让那一般弄法的恶魔去横行，那么这世界不久就会弄到人吃人的地步，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无辜被杀的。我们不愿意别人无辜被杀，不愿意自己无辜被杀。那么，让我们起来表示我们对于政府的蛮横残酷的行动和卑污的谋杀二者的抗议。使那杀人的刽子手知道我们不是任人屠杀的驯羊。

七月十日快要到了，可悲可痛可怖的七月十日啊！……难道我们不是人么？难道我们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么？为什么我们欧洲、美洲、亚洲许许多多万的人，还敌不过那几个弄法的官吏？他们几个人便可以任意杀我们许许多多万人所要救的两个无罪的人，这是个怎样不合理的卑污的制度啊！波士顿“萨珂与凡宰特援救会”费了五万小时的时间，散布了二十万份书报，花了三十万元美金，为的是救两个无辜受罪的工人，然而结果得到的却是七月十日的死刑。难道人民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比起来便是这样的薄弱么？从此我们该可明白了政府的罪恶罢。

七月十日快到了，快救我们的萨珂与凡宰特！假若美国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全世界许多万工人的援救，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抗，各党派以及知识阶级的抗议，五百万人的请求书都换不了萨珂与凡宰特的死刑，假若他们果真死了，那么，

我们要起来替他们复仇！作一个例子给一切政府看！

勿忘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十日！

〔附记〕 此稿草完后接到美国《到自由之路》号外：《国际无政府主义团告工人》的檄文，主张激烈的直接行动，反对要求减刑，“只有总同盟罢工才能够阻止这两重的谋杀，争回我们两个劳工同胞的自由。”最后的几句话是：

美国的工人们，

这是要你们来阻止这违反人道的罪恶了！

现在是你们在受审判！历史要来裁判你们！

你们的小孩会伸出手指来责骂你们，并且问道：“爸爸，萨珂与凡宰特被谋杀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

响应我们的呼声，预备总同盟罢工罢！

采取直接行动！

国际无政府主义团启

七 萨珂与凡宰特之死

萨珂与凡宰特死了，六年来麻沙秋谢州的惨剧竟这样悲惨地完结了，这样的事几乎使人不能相信！然而事实明白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六年来的一线希望终于被铲除净尽了。只要有“大拉”的势力存在，正义是不会来的。

这件事的经过——萨珂与凡宰特之死，确实值得用莎士比亚写悲剧的笔来描写的。在此我们既限于篇幅又限于能力，只得简略地叙述如下：

自从麻沙秋谢州州长弗勒发表了她的决定后，萨珂与凡宰特的命运便被决定了。执行死刑的日子定在八月十日的晚间。

萨珂与凡宰特自七月十八日起便在监狱中开始绝食。

八月五日萨珂在狱中宣言：“我们以死自豪，我们像所有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陷于同样的命运。”凡宰特的宣言是：“我们为无政府而死，无政府万岁！”

八月十日晚间在预定执行死刑时期的前三刻钟，弗勒宣布把他们的死刑延期十二日，改在二十二日晚间执行。

这十二日间，凡宰特的妹妹从意大利赶到了波士顿，她要救她的哥哥。萨珂的妻子及许许多多的人都异常努力想从电

椅上救出这两个无罪的人来。欧美各国各大都市都有人在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附近掷炸弹。美国的各大地方也常有炸弹爆炸，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军警成了唯一的主人，资产阶级真预备着来举行血宴了。

至于萨珂与凡宰特呢，他们在监狱中安静地等候着死刑的到来。长期的绝食使得他们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然而他们的精神仍是极其强烈的。

二十二日晚九点零五分，萨珂的妻子、凡宰特的妹妹和全国被告律师去见弗勒。他们谈话至一小时半之久，这两个可怜的女子哭着甚至跪着向弗勒哀求，求他不要杀掉那两个无罪的人，弗勒冷然地答道：“我是依着法律而行的！”萨珂夫人甚至向他叫道：“你有孩子，我也有孩子，照着父亲的地位来处置这件事罢！”那弗勒像狗一般的听不懂这样的人话！他丝毫不动心，什么希望也都没有了。

到了十点四十八分，狱吏通知萨珂与凡宰特说，他们要在今晚被处死刑了。

萨珂正与他的父亲写信，便请狱吏代他投邮。凡宰特在囚室里闲步！听了狱吏的话冷然地回答道：“人们终于会屈服在真理之前的。”

实在，他们早已知道他们的生命在这天晚上是一定要消失的了。在七点钟时萨珂的妻子和凡宰特的妹妹便进监狱来，和她们的亲爱的丈夫和哥哥作最后的告别，这一天她们已进了监狱三次了。

被告律师麻司满诺(Musmanno)在十一点十五分钟曾到

监狱来会萨珂与凡宰特，却被拒绝了。麻司满诺便向新闻记者宣言：“我愿意见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无罪的。便是拿全世界的电椅和绞首台来威吓我，我也要说明他们是无罪的。”

十一点三十分，监狱长带着牧师及行刑吏等来了。麻司满诺和一个新闻记者这时才得着许可进狱。

教堂的钟声铛铛地敲了十二下，牧师便来替“罪人”祷告，叫他们忏悔。他们都拒绝了。他们是无神论者，而且他们是无罪的。

马德诺司的死刑最先执行。他是因强盗杀人案件被判死刑的，他曾自认他是南布兰垂枪案的真犯，萨珂与凡宰特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然而裁判官赛叶说他的供词全是谎话，便把它一笔抹杀了。

马德诺司在一点零九分气绝。

萨珂在一点十一分钟被带进刑场。他的身体异常衰弱，然而他两眼放出光辉，以坚定的脚步走到电椅上坐下。他用意大利语叫道：“无政府万岁！”然后用英语说：“别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别了，我所有的朋友。”最后又向旁观者说：“诸位先生，晚安。”他的最后的话说得不甚清楚，但可以分辨得出是“别了，妈妈！”

狱卒握了他的手后便离开了。电流开始通过他的身体，直到一点十九分医生才宣告他气绝身死，共经八分钟的时间。

狱卒刚把他的尸首搬到一个屏风后面，凡宰特便被带进来了。

凡宰特异常安静，不露丝毫惊恐之色。一进刑场，他便自

已向着电椅走去，他的态度很勇敢。他握了狱吏亨得利的手，向他说：“谢谢你，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事。”然后便向旁观者说：“诸君，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自然有时候我也不免有小小的过失。我感谢你们为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我什么罪都不曾犯过，不仅别人所诬我的罪我没有犯过，便是所有其他人间的罪恶我也没有犯过。”他的最后的话是“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他还想说下去，而那刽子手已把盆兜笼在他的头上了。

过了六分钟以后，凡宰特便不生存在这世界上了。

大罪已成。从此在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污点是洗不去了。这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一点十一分到二十六分的时间，在人类史上是不朽的。

这时候离监狱不远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有两个女子。在半小时的时间中鲁意加·凡宰特手里拿着十字架替她的哥哥祈祷。而露莎·萨珂，她和她的丈夫一样是无神论者，她只是默默的等候时间的到来。最后，一点二十九分，一个电话来报告说：“什么都完了！”那两个女子便大哭起来。

从此什么都完了！

八 死者与生者(杂记之一)

当萨珂与凡宰特被害的消息传到法国的时候，君毅同志自巴黎写了一张信片给我：“两个无罪的人已经死了！现在所等的是那有罪的人的死！我告诉你：不会久候的！”

在同天中我写了一封信给美国《到自由之路》社的同志们，这封信后来在《到自由之路》第四卷第六号上发表，现译出如下：

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了。不要忘记他们含笑而受电椅死刑！萨珂在他一生之最后时间中还高呼：“无政府万岁！”凡宰特在电椅上还辩明他是无罪的。他们死了；他们做完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做得像“一个人”，像“一个殉道者”。这是他们，他们体现出无政府之美！这是他们，他们为着信仰而流了生命之血，并且相信着他们的殉道可以救赎人类的！

然而当他们被杀的时候，当这两个无罪的人被烧死在电椅上的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曾知道而且高呼了多年说他们是无罪的，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们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又在什么地方去了呢？

那些曾防护他们的生命，力争他们的自由，证明他们的无罪（如凡宰特在一封信里所说）的欧美两洲的人在什么地方去了呢？

“银元胜利了！法律胜利了！无政府失败了。”资产阶级重又叫着他们在四十年前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被害时所高叫过的这样的话句了。不错，银元能买得到一切，然而它能够买得正义么？法律能谋杀一切，然而它能够杀死全世界的良心么？正义永不会死！无政府永不会失败！萨珂与凡宰特已尽了他们的责任，现在应该轮着我们来尽我们的责任了，我们应该来证明正义永不会死，无政府也永不失败！

同志们，快乐起来罢！鼓起勇气来！不要忘记凡宰特曾坚决地告诉我们：“为无政府奋斗，毕竟是度过生活之最美丽的方法——要是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

诀别了，我的两个勇敢的高贵的同志萨珂与凡宰特啊！我们永不能再听到你们的话了！然而你们所说过的，所做过的都还在，而且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至于我，我是一个青年同志，而且凡宰特曾向我写道：“我希望我的旧经验来完成你，鼓舞你，”现在我只能在这里写出几行来表示我的谢意以及你们的殉道所给与我的印象了！

诀别了，我们的两个高贵的同志啊！

美国同志们！“坚定你们的信仰，勇敢地前进罢！”（凡宰特语）

《到自由之路》社书记伯沙达女士在覆我的信中有几句动人的话：

你的鼓励的信接到了，然而我们不能立刻回答，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痛苦。我们失掉了两个最好的同志，对于我们确是损失太大了，因为我们之中有的和萨珂与凡宰特相识，有的像你那样和他们通过信。

我个人在最后两个礼拜内是在波士顿住着，我亲见着我们两个同志被害后的面容……我们曾参加葬礼，并且跟随着这两个反抗者的遗体，同着千万的人游行波士顿各街市。

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来回你的信。我们觉得我们同志所未完成的工作，应该由我们继续做去。我们决定继续前进，直到我们达到目的，或者志未成而身死。后一条路倒是较稳当的……

八月十二日在萨珂与凡宰特被害前的十一天，我在接到凡宰特第二次寄给我的信之后，就写了一封信与萨凡援救委员会：（波士顿）

这里我有一封信给凡宰特，但是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入他的眼帘，因为我知道他在十一天后便要烧死在电椅上了。

亲爱的同志们，我以至诚的心感谢你们。你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两个纯洁的同志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多活了

几年，以至于今日；你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两个清白的同志的无辜得以大白于天下。然而在这七年的苦斗之后，我们会相信这两个无辜的人竟会被冤杀么？

美国人啊！华盛顿，托马·班的子孙！你们在四十年前杀死了十九世纪中五个最好的人，现在居然敢在四十年后的今日未把二十世纪中两个最好的人杀掉么？让后人来裁判你们！……

然而萨珂与凡宰特终于被烧死在电椅上了。我在十月二十七日的又寄信给萨凡援救委员会道：

请原谅我的长久的沉默，因为在我们这两个好同志在电椅上被烧死的惨痛的日子中，我的悲哀是言语所不能形容出来的。我，我曾深知道他们是无罪的人，我曾叫道，他们不应该死，然而最后竟见着了这样残酷的时候，在其中我们的殉道者所受的痛苦是极其可怕，而且非人类感情所能了解的。“人”是时常忘恩的，他时常杀死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凡寻求全人类的幸福的人总是受着人类的虐待，甚或为人类所杀。然而后代的人是会来裁判的。

我们的同志毫无遗憾地死了。可怜的是：我们不能和他们同死！我们还被遗留在这个荒凉的沙漠之上。

法律的谋杀已大功告成，然而我们的工作却正开始。因为渴血的畜生不敢担着因理想而杀我们的同志的恶名，他们便说：“这是强盗杀人犯”；但是因为我们深知我

们的同志是无罪的，我们便应该来向全世界证明萨珂与凡宰特是无罪的，是因理想而被杀的。

我们不要忘却萨珂的最后的话：“不要使我们白白地死了！”要使他们不会白白地死去，有两个方法：第一，继续他们所身殉的理想而奋斗；第二，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因此，便是殉道者。

所以萨珂在临死时高呼：“无政府万岁”；而凡宰特也说：“我是一个无罪的人！”

因为我是这两个同志的信徒之一，所以我愿意尽力来与你们合作。……

一〇 殉道者的遗书

一 萨珂、凡宰特致全体同志信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敌人决定了我们的死期，我们活着的日子已不多了。

你们大家为了想宽慰我们的苦境，减轻我们的负担，帮助我们接受我们的命运的缘故，送了无数感人的话语来，——无穷尽的鼓励 and 爱情从你们的心里流注到了我们的心中。

对于你们这样的信，我们如何能够随时规则地答复你们呢？

我们这一封信是写与你们大家的，请你们原谅我们不能随时答复所有的来信，并且告诉你们大家说，你们都是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是已知道的或不知道的，有信来的，或是沉默着的，都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记忆着你们一直到死！

我们现在不要说死，且来说生罢。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愿你们大家勇敢罢，快乐罢！不要因失败因忧愁而灰心，而让步。

敌人能监禁、虐待、残杀我们，毁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机关，烧毁我们的书报，但他不能消灭我们的理想，不能消灭真

理和正义！

坚定你们的信仰，勇敢地前进罢！

尼古拉·萨珂 巴尔托罗美·凡宰特 一九二七年五月

二 凡宰特致蒂甘信

亲爱的同志：

你的信接到了，这很使我感动。

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与全体同志的信中，我要提到“沉默着的同志”呢？正因为我知道有许多像你那样年轻的人，还有许多年老的男男女女，他们默默地和我们的感情共鸣，防护我们的生命，力争我们的自由，证明我们的无罪，辩护我们的信仰，我们一直到死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同志啊，我感谢你们大家不顾我们的时代的残酷和黑暗，竟为我们两个可怜的工人做了这许多的事，这样的事在从前一般人，只会为圣哲或帝王做的，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受着大的感动，我们的心也就宽慰了。

这毕竟证明出来人类平等的原理（这种权利是基础在人类的天性上面的，人人都应有，不分什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已为数百万的人承认而实行了。这一点更可以乐观的。

然而这也并不就是说我们的主义是命定了必胜的。不！我且和你谈谈这件事罢。人类的历史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个人的要素和宇宙的要素；这就是说人类大抵分为二类：一是专制，一是自由。个人或为专制的暴君或为争自由的战士；至于

宇宙，我们是从那里来而且生活在其中的。在现在宇宙的要素还是要超过人类的意志和力量之上。除去宇宙的要素而论历史，那么历史可以说是完全由人意而定的。我们要它如何它便如何。像每一个现象一样，历史是“质”与“量”的结果，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便是这样想的。所以要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知道如何可以得到争自由时所必需的“质”与“量”的方法，我们便可以得着胜利的。不然，我们便不能得胜。在我看来，人类和历史都不是预先决定了的。“自然”给了我们以无量的宝藏，使我们能够保证生活的安全和提高；它燃起了我们心中渴望自由不能熄灭之火，而它赋予我们以如此的能力，假若这能力能够自由发展起来，其结果一定是很可惊异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衰滅的文明，灭亡的民族又告诉我们的历史相反的一面。我们看：当机器和教化二者的进步使我们的生产力增加时，而工人们仍处在贫困缺乏的苦境中，而且工作愈不卫生，愈加费力；当学术及物质条件大体地提高进步时，而人民堕落的程度愈深，道德人格遂归消灭，体力亦逐渐败坏；最后看人类普通情形的两面：要不是革新我们自己而生活，便是灭亡。这些事实都是告诉我们而且向我们证明历史的另一面。这历史的消极的一面是很难明白而且更难解释的。然而就是这个，它使得许多伟大的心灵如巴尔扎克(Balzac)、莎士比亚(Shakespeare)等等说人类是在一个紧密的圈子里走来走去，时常走回到以前的脚步上面去的。你也许曾遇过或者将遇着更多的流氓、教徒、愚夫(要不是三者兼而有之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世界永远

是这样，而且……”青年的同志啊，不要管他们，你仍然继续前进罢！为“无政府”而奋斗（纵然有人说是愚蠢的举动），到底是度过生活的最美丽的方法——要是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

“无政府”的真意义就是在了解而且以解放生活、解放个人、废除人对人的压迫和掠夺等等方法，来消灭这种历史的消极结果。因此“无政府”便是我们所能处理的生活的唯一方法和道路。然而这是要由人们希望的，要由人们的努力来决定而且实现的。它自己不会自然实现。（中略）

请为我致意巴黎的一切同志，并请致意中国同志和中国人民！

不要灰心罢，且快乐起来！我以兄弟般的心情拥抱你，我想尼克^①也许会写信与你；然而无论如何我在这封信里也已表示出了他的感情。我代他问候你和所有你的同志们。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三 萨珂给他的儿子但丁的最后一信

我的爱儿和同志，

我从我和你最后一次见面以来，我就常常想写这一封信寄与你，然而长久的绝食和恐怕无力写完这信的思想，又使得我几次把笔放了下来。

近来我又停止了绝食，当我刚刚这样做了之后，我便立刻

① 尼克：指萨珂。

想起你，想写信与你，可是我又明白我的精力不足，不能够一次写完这信。不过我想无论如何总得要在他们把我们再带进死囚牢之前写好这封信，因为我深信只要法庭一旦拒绝再审，他们便会把我们立刻带回死囚牢中去的。而且在星期五到星期一之间如果没有意外的事发生，那么在二十二日的中夜我们就会被烧死在电椅上了。所以现在我来给你写这封信。我的爱儿，你的父亲在这里，他以像从前那样的爱，那样的坦白诚恳的心来和你谈话，好像我们还在一处，像从前那样。

我从没有想过我们的不可分离的生活是能够被人分离开的，然而一想到这七年来的苦痛，就好像这样的事果然已经实现了，不过它确实不曾改变过我的爱情。我的爱还是一样地保存着，而且更加强烈了。我说我们说不完的相互的爱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些，不仅是多，而且还是伟大，因为你能够看见真正的兄弟般的爱不仅存在享乐中，而且还更存在受苦的奋斗中。但丁，记着这个。我们已经证明出来了，而且我们也以此自豪。

在这种长期的死刑之际我们也受够苦了。我们至今还要反抗说我们是无罪的，像我们从前反抗那样。我们永远要力争我们的自由而反抗。

我近来之所以停止绝食，这是因为我的身体内已经没有活力了。因为我从前用绝食方法来表示反抗，也和我今天的反抗一样，所力争的是生命，不是死亡。

我停止了绝食，因为我愿意回到你的小妹妹茵乃、你的母亲和一切亲爱的朋友的怀抱中来。所以，爱儿啊，今天在我的

身体内生命开始慢慢地安静地复活起来了，然而却时时带着死之幻象和悲哀。

我亲爱的儿啊，在你的母亲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你的话之后，在我日夜地梦想着你之后，我到底见着你了，这是多末快乐的事！我居然得和你谈了许多话，像我们从前常常谈的那样。在那次的会面中我向你说的话愈多，我心里想说的话愈说不完，然而我知道你将永远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你会永远不变地孝敬你那十分爱你的母亲；我也不再絮絮地拿这样的话来搅乱你的心情了，因为我相信你将来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你不会忘记我所告诉你的一切。我知道这个，而且我还明白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话一定会使你伤心，但是不要哭，但丁，你千万不要哭，因为许多的眼泪已经浪费掉了，你的母亲整整哭了七年，却从没有得着一点好处。所以，爱儿啊，你不但不要哭，而且要强健起来，以便能安慰你的母亲。当你愿意安慰你的母亲，把她从失望与悲痛之深渊中拖出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平日安慰她的方法。带着她到清静的乡下去散步，到处采摘野花，休息在浓密的树荫之下，听着溪流的和谐的节奏，享受自然母亲的温柔的静寂，我相信这一定可以使她忘掉现在的苦痛，就是你也会高兴。但你要记着你父亲的话：在享受幸福的时候不要只顾到你自己，你应该去帮助那些正需人援助的弱者们，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好友，他们都是我的同志，他们都是像你父亲和巴尔托罗^①那样地奋斗那样地被害的人。他

① 巴尔托罗，指凡宰特。

们和我们一样是为着替一切穷苦的工人争自由求幸福而奋斗而被害的。在这场生活的斗争中你将找到更多的爱，而且你会为人所爱的。

你母亲告诉过我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当我睡在这万恶的死囚牢中的时候你所说的话，——她的叙述给了我以一个大的快乐，因为从她的话里我知道你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常常梦想的那种可爱的小孩。

明天的事究竟如何，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不过如果他们把我们杀掉了，你必定不要忘记以感激之微笑来看你父亲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如像看你的最亲爱的人一样，因为这些人爱你，恰如他们爱其他一切被迫害的同志们。我告诉你：你的父亲，——你的为你的全生命而又爱你的父亲了解他们，而且明白他们的高贵的信仰（也就是我的），他们为了我们的家庭所作的崇高的牺牲，因为我曾和他们一起奋斗，而且我明白他们还保持我们的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时候他们还能够把我们我们从电椅上救出来。这是为了安全与自由的缘故而起的贫富间的斗争。爱儿，这种不息的生活斗争的原因，你在将来会明白的。

当我躺在死囚牢中的时候，我听见墙外的小孩们的歌唱和柔和的声音，在那里是充满了生命与自由之快乐；而一步以外就是我们的狱墙，在墙内深深地埋葬着三个被活埋了的灵魂之苦痛。这时候我想起了你，我深深地想到你。那些小孩们的声音使我常常想起你和你的小妹妹茵乃。一想起你们，我便无时无刻不想和你们相见。然而我又觉得你们不到这死囚牢

中来倒也很好，因为你们可以免得看见那三个痛苦地躺着等候死刑的人的可怕的情形，我不知道这一幅图画对于小小的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不过我想如果你不是十分多情易感的，那么这对于你也会有好处，当你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可怕的形象来把二十世纪使用这种残酷的迫害和不法的死刑之奇耻大辱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但丁，他们能够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们不能够毁灭我们的思想，这思想是永远存在的，而且会是未来青年的福音。

但丁，当我说三个人被活埋了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和我们同被囚在死囚牢中的还有一个名叫马德诺司的青年，他将和我们同受死刑。他已经到过这死囚牢中两次了。啊，这死囚牢，这可怕的屋子将永远为麻沙秋谢州人民的未来留下一个污点，这可怕的屋子应该用真正进步之大锤来打碎的。麻沙秋谢州的人民应该把这可怕的屋子毁掉，另外造一个学校来教养世间那些无依靠的孤儿们。

但丁，我再说一次，你要在这些惨苦的日子里爱而且扶助你的母亲和一切亲爱的人，我相信你的勇敢和好心会安慰他们的。也不要忘记多少爱我一点，因为我的但丁哟，我爱你而且常常想到你。

为我致意所有亲爱的人，为我爱而且吻你的小妹妹茵乃和你的母亲。我诚心诚意地，爱怜地拥抱你。

你的父亲，你的同志 一九二七，八，十八。

巴尔托祝你好。我想你的母亲会帮助你了解这封信的意思。要是我的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我也许写得清楚

一点,好一点,然而我现在已经是异常衰弱了。附及

四 萨珂寄给他的六岁女儿茵乃的信

我亲爱的茵乃:

我希望你能够懂得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话,我又希望我能够写得十分浅显,因为我非常渴望你能够听到而且觉得你父亲的心的跳动,我十分爱你,你是我的最亲爱的小人儿。我愿把你的小小的而且如此亲爱的信放在我的深处,一直到我死之日。我死的时候,你的信也要和我埋在一起的。我非常爱你,爱你的哥哥但丁,爱你的神圣的亲爱的母亲。我若得和你,你的哥哥,你的母亲同住在一处,在一所小小的田庄上,跟你学习你的真诚的话语和温柔的爱情,那就是我的苦斗的生涯中的最大的宝贝和最甜蜜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开始教你读书,写字,或看你在绿的田塍上跳荡、笑语、唱歌,在树丛中摘取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那一株,又从清莹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过这样的幸福生涯,我也希望那一切贫苦的女儿们和男孩们也能够快活地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涯。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下层阶级的梦魇已经使你父亲的心灵变成非常愁苦的了。本来世间一切美与善的东西都是自然母亲所给予我们大家的,为的是来达到自由之享乐。然而这个垂死的旧社会中的人们却把我生生地从你的哥哥和你可怜的母亲怀里拖走了。但是,不管这一切,

你父亲的自由精神还是存在的，我为了它而得生存至今，我为了那将来有一天我会回到人间，回到你亲爱的母亲的怀中，回到我的朋友和同志中间之梦想才得生存至今，但是我是多末不幸哟。我知道你是很好的女儿，我相信你会爱你的母亲，你的哥哥以及一切亲爱的人；我相信你也会多少爱我一点，因为我曾爱过你，而且现在也还在爱你。然而，茵乃，你却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你是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幻象中，在这囚室的四角，在天空中，在我从铁窗的格子里所能看见到的一切地方上。同时为我致意所有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特别我们所爱的人们。为我爱而且吻你的哥哥和母亲。请你接受那个十分爱你而且不断地想念你的人的接吻和抚爱。

你的父亲 一九二七，八，十八。

巴尔托罗美问你们大家好。

五 凡宰特致但丁信

亲爱的但丁：

我至今还希望而且我们要奋斗到底来力争我们的生存权和自由权，然而国家、金钱和反动之一切势力都来拚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是争自由的战士，是无政府主义者。

关于这一层我不多写，因为你现在年纪还轻，不懂得这些事情和我很愿意向你说的别的事情。

不过你将来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会明白我们的案件，和我们所将身殉的主义。

我问你说这些话，是因为我深知道你的父亲不是一个罪人，而是我一生所知道的最诚实，最勇敢的人之一。将来有一天你会懂得我现在所告诉你的话。你会明白你的父亲为了他所信的众人的自由和正义，已经把人类心灵所视为最亲爱最神圣的一切完全牺牲了。那一天你就会以你的父亲而自豪，而且那时候你如果是十分勇敢，你也就会参加那一场专制与自由之苦战而填补你父亲所留下的空额，你会洗刷我们的清名，洗清我们的血迹。

如果我们现在被害而死，那么你将来长大成人懂得这悲剧的全真相的时候，你会明白在这奋斗，忧愁，激情，痛苦的八年中你的母亲对于你，对于你父亲，对于我是何等地勇敢，何等地善良。

从今以后你要勇敢地善良地待你母亲，待茵乃，……而且尽力去安慰她们，扶助她们。

我还希望你记起我，把我当做你父亲的一个同志，一个朋友，而且我确切地告诉你：我决不是一个罪人，我也从不曾杀过人，抢过东西，不过尽力奋斗为众人争自由，使罪恶不复再现于人间。

但丁，记着，如果有人说起你父亲和我，与上面的话不相符合时，那个人便是一个谎言者，他诬蔑了那两个勇敢而生，无罪而死的人。但丁，你还要记着，如果你父亲和我肯做违背信仰的叛徒，伪人和懦夫，我们也决不会根据那些他们假造来杀我们的证据，来判定一只癞病狗的罪，来杀一只受毒垂死的蝎子。他们可以给那一个杀母亲的恶人一次再审，却把我们

两个无罪的人要求再审的呈文几次驳斥了。

记住，但丁，永久记着：我们不是罪人；他们购买伪证来判我们的罪；他们不给我们再审；而且如果我们在受了七年三个月零十七天的说不出的苦刑之后而被杀，这是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是站在穷人这一边来反对人对于人的掠夺和压迫的缘故。

我们案件的文书，你和别的人可以蒐集而保存起来，它们会向你证明：你父亲，你母亲，茵乃，我的家庭和我都是美国的金钱政治的反动下的牺牲者。

将来有一天你会完全明白上面的话的意义。那时候你会尊敬我们。

但丁，你要永远勇敢，永远良善。我拥抱你。

六 诀别的信

——致萨凡委员会

我们的事完全绝望了，我们不得不一死了，但这并不曾减少我们对于你们的尊重与感谢。你们在这七年中对于我们和我们家庭的帮助与同情，我们实在找不出话来表示我们的感激。朋友们和同志们，现在这审判的悲剧快要完结了。你们大家要同心协力地结合起来。要死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的理想是不死的，而且还有你们（我们的同志们）千千万万地活着。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并未被人征服。请你宝贵着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悲哀，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激情，

来进行将来的战斗和伟大的解放罢！

在我们的悲剧的最黑暗时期中，你们大家要一心一意地结合起来。我们还保存着这一点热烈的心。为我们致谢世间的一切朋友与同志们。

我们拥抱你们大家，而且以一个充满了爱情的心来和你们大家诀别。

祝你们大家万岁，自由万岁！

你们的生死朋友

尼古拉·萨珂

巴尔托罗美·凡宰特 一九二七，八，二十一。

法律下的大谋杀*

要说法律不是支配阶级杀人的工具，也许一般人不肯相信，然而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证据，这便是轰动全世界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关于这件事在上海的《民钟》杂志上将有一长篇《死囚牢中的六年》详述此事，这里因为篇幅关系无多写之必要了。萨珂与凡宰特本是两个旅美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波士顿警察署杀害革命党的暴行，于一九二〇年五月被捕。最初麻沙秋谢州政府决定驱逐他们出境，但后来忽然收买一般证人，说他们两个曾犯过强盗杀人的罪，于一九二一年由该州政府法庭判决了他们的“电椅死刑”。但因多数的人都反对此种不公正的谋杀，政府也不敢立即执行了。这样，在死囚牢中那两个无罪的革命党竟整整的等待了六年多了。死，今天——明天——后天——六年，这便是法律的公道！而且去年夏天，一个强盗犯马德诺司在法庭自认，政府疑惑萨珂与凡宰特所犯的罪名实是他一个人做的，与萨珂、凡宰特无关。许多人因此要求再审，然而竟遭裁判官赛叶的拒绝。而且在轰轰烈烈的反对声中，今年四月由最高法院宣布了最后的决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定——七月十日执行死刑。萨珂与凡宰特泰然自若的静听死的宣告，随即开始发表沉痛的演说表明他们的无罪和他们的信仰，这使得旁听席中许多人都哭起来了，那裁判员赛叶也觉得异常惭愧。在以前全世界的有良心的人都表示过他们的抗议。现在从奥兰多、瑞典、德国、瑞士、葡萄牙、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有抗议书致美国公使馆或麻沙秋谢州政府。柏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也有沉痛的宣言檄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各国的学术界也有主持正义的宣言。人权协会等团体也尽力于援救运动。至于无政府主义者运动的激烈更不必说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的老将福尔旅行各城市举行游历演讲，每次的结果都是全体听众一致议决反对这法律的谋杀。法国较进步的各党派联合起来组织一萨珂与凡宰特委员会，发出签名单四十万份，每份可容一百七十五人，预备在六月十九日得到五百万人的签名，送到美国公使馆，表示法国的民意。在美国反抗运动的激烈，为援救他们而举行的短期罢工，到处都有。波士顿的萨珂凡宰特援救会已成立了好几年，散发了无数的传单和书报，尽力于援救的运动。最近总同盟罢工的日期已经决定，即将举行。这是黑暗与光明、支配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府与我们争胜负的日期了，大家快前进呀！

凡宰特四月六日在死囚牢中发出下面的与“到自由之路”社的某同志：“这早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一个囚犯和一个狱卒告诉我麻沙秋谢州最高法庭昨天已拒绝我们的要求——要把我们交给刽子手。我不曾听见说过，但我相信列席的法官都已签了名。这事件的重大罪名使他们不得不全体团结一

致：我已向汤姆生君及其他希望以为法官中自己会闹意见的人们说过这样的话了。”

“好罢，这对于我就是电椅和死刑。然而愿你们大家勇敢罢，不要为我而悲伤。祝你们大家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们也来叫一声“无政府万岁！萨珂与凡宰特万岁！”

法律下的大谋杀*

——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以后

吃人的魔王完成了它的工作。法律下的谋杀“大功告成”。电流通过了萨珂(Sacco)与凡宰特(Vanzetti)的身体,这两个无罪的人——我们的勇敢的同志终于死在电椅上了。

不管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援救,不管全世界各大城市的示威运动,不管各国报纸上的反对,不管我们无数的同志为正义为自由为人道的奋斗,甚至不管他们两个是无罪的人,那弗勒(Fuller)那赛叶(Thayer)和他们的刽子手们终于把萨珂与凡宰特烧死了。

千千万万人的援救是错误的!各大城市的示威运动是错误的!各国报纸上的反对是错误的!正义,自由,人道也是错误的!只有弗勒是不错的,赛叶是不错的,他们的几个刽子手是不错的!萨珂与凡宰特该死,无罪的人都该死,我们都该死!该活的只有弗勒,只有赛叶!这是不错的,他们今天杀了萨珂与凡宰特,明天便要杀其他无罪的人,我们不久也就会被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黑浪。

他们杀了。

法律胜利了，金钱胜利了，弗勒和赛叶胜利了！法律是甚么？吸吮无罪的人的血的东西！金钱是甚么？吃好人的肉的东西！弗勒和赛叶是甚么？——吃人的魔王！

我们不会忘记：当全世界无数的人苦痛地等着这最后的悲惨结局时，当萨珂的妻子和凡宰特的妹妹跪着向弗勒哭求，求他不要杀这两个无罪的人时，那弗勒一点也不动心，冷然地说他是依着法律而行。

我们不会忘记：全世界无数的人在哭着，忧愁着，等候着弗勒的最后决定，而弗勒却安然地玩他的果尔夫球。这是依着法律而行的！

“法律胜利了，无政府失败了。”资产阶级在芝加哥悲剧闭幕时曾这样地高叫过，现在呢，这样的呼声又会响起来了。

法律果然胜利了么？无政府果然失败了么？告诉你——吃人的魔王！只要正义不死，真理不灭，法律是决不会胜利的，无政府是决不会失败的！杀几个人，烧几本书，难道就杀得死正义，烧得掉真理么？

而且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两个勇敢的同志却昂然地在电椅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死了，死得极勇敢极高贵，他们死得像殉道者，像伟大的英雄。正如法国《自由人》周报所说：他们像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生，又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死！就在电椅上，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表示出来他们是为真理为正义为人类而死。而且他们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向全世界抗议他们是无

罪的人！这样他们的一生真算是“完全”的了。在生，他们是生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临死，他们又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难道在那一般困顿床褥，带着可怜和恐怖之色，终日哀号，终日呻吟，一秒一秒钟的，像脱了毛的狗一样的死去的资产阶级之中，我们能找着一个这样的人么？那么，究竟谁胜利了呢？

法律何尝胜利？金钱又何尝胜利？胜利的还是那两个不朽的人——我们的同志萨珂与凡宰特！

至于我们呢，我们不要忘记奈柴尔(R. Reitzel)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殉道者墓前的演说。他的最后的话是：

我们没有理由来哭死者，他们是死得极其勇敢的。而且像十字架曾是爱的象征那样，十九世纪的绞刑台（加一句：二十世纪的电椅）也就是自由的象征了。但我们应该哭我们自己，哭我们自己的羞辱，哭我们的优柔寡断，哭我们的懦弱。

我们离开死者的坟墓时，大家应该记着黑尔威(Herwegh)的话：

我们已经爱的够多了，
让我们最后来开始憎恨罢！

萨珂与凡宰特是无罪的人*

在本报第一卷四期悼萨珂、凡宰特一文里，我曾说过：

法律果然胜利了么？无政府果然失败了么？告诉你——吃人的魔王，只要正义不死，真理不灭，法律是决不会胜利的，无政府是决不会失败的！杀几个人，烧几本书，难道就杀得死正义，烧得掉真理么？

现在事实证明出来，我的话是完全不错的，是有力量的。在萨珂、凡宰特上了电椅之后，真理果然大白于天下了。凡宰特是一个无罪的人。

原来一九一九年麻沙秋谢州布立奇瓦达地方一家制鞋公司的会计，带着一万八千元美金去发工资，半路上遇着强盗，幸而他早有防备，把强盗打退了。第二年四月十五日南布朗垂的一家制鞋公司的会计和护卫在同样的情形中被强盗杀死了，抢去美金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元。

后来萨珂、凡宰特二人因政治事件被捕时，警署把这两件事推在他们二人的身上。断定说两件事必定是同样的人做出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署名黑浪。

来的。然而十二月二十四日那一天萨珂确实在工厂里做工，所以法庭无法把他牵连进去，只有卖鱼者凡宰特，因为证明他二十四日那一天在普立毛斯卖鱼的证人都是意大利人，而法官赛叶说意大利人的话都是靠不住的，结果便被认为此案的主犯，得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凡宰特既然犯了一件盗劫案，而这两件盗案又经人断定是同样的人犯的，那么南布朗垂强盗杀人案的凶手不消说就是他了。萨珂既然是他的同国人又兼同志，那么萨珂也是本案的一个正凶无疑了。

有了这种奇妙的推论，法庭方便可以用三个说谎人(Dolbeare, Reed, Vangie, 他们的口供不但互相矛盾，而且不合情理)的伪证，抹杀证明凡宰特无罪的三十一个证人的话了；便可以用两个谎言者(F. Deslin 和 L. Pelzer)、一个患歇斯特里病的女人(Splaine)、一个娼妓(L. Andrewo)和一个窃贼(C. Goodridge)的伪证，把三十二个到庭证明萨珂无罪的人的供词抹煞了。

这样，两个无罪的人便被送上电椅了。

然而真理是杀不死的，在萨珂、凡宰特在电椅上殉道之后，真理终于大白于天下了。布立奇瓦达盗案的正凶西尔瓦(Frank Silva)已正式上书于纽约州，承认此案是他和他的同党所犯，与凡宰特无关。他的原信甚长，我只把中间的两节引出来：

……他们都同意了。渐渐，大约在我走开后的十五分钟罢，我看见那车子走下来了，约在二百尺远的光景，我便说“孩儿们，车子来了，我们去罢”。……我说“我们去

罢”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车便立刻向后退了，停在街心附近。你们知道车路在街的中心，在制鞋厂付工钱的车子的后面有一辆电车。我们停车时，离制鞋厂的车子只有十五或二十尺的光景。他们都离了车子，大家叫道：“停车。”制鞋厂车子上，车夫坐在前面的座位上，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坐在一边，另一个我相信是坐在银钱箱上。

我们叫“停车”的时候，那车夫并不停车，还是继续开着车前进，突然间枪弹从两面射来。我们中大部分的人都躲在离哈列街几尺远的树木或柱杆后面……突然间我听见一阵闹声。我们又听见玻璃碎声。制鞋厂的车子是再也看不见了。……

这样看来，凡宰特不是与布立奇瓦达抢案无关，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吗？然而裁判员赛叶说意大利人的话不可靠，就把许多证实凡宰特无罪的供词抹煞了，把一个无罪的人判了十五年的徒刑，又以这个罪名做旁证，把两个无罪的人送上了电椅。

法律是什么？不是杀人的利器吗？

法官是什么？不是吃人的魔王吗？

凡宰特是无罪的！

萨珂是无罪的！

强盗西尔瓦还有良心，在凡宰特死后毅然承认布立奇瓦达的抢案是自己和同党的犯罪，来洗清凡宰特的不白之冤，犹

如强盗杀人犯马德诺司还有良心，在萨珂、凡宰特二人定罪之后，毅然承认南布朗垂的强盗杀人案是自己和同党的犯罪，来救两个无罪的人的性命。

然而法官借着法律的名义却把那两个无罪的人送上了电椅。

在萨、凡案真相大白后的今天，我们还不明白法律的性质吗？还不承认无政府主义者的伟大吗？

寄《革命周报》编者的信*

编者先生：

我曾反对过《革命周报》的主张，便在现在我也反对它的，——虽然我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虽然我曾攻击过《革命》，也许在将来我还要攻击它，然而我却要向你说明，你们关于萨珂与凡宰特（你们译作凡齐蒂）的文章我是极表同情的。不但我，我想假若萨、凡二人还存在的话，他们也要感激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正如凡宰特向我所说的那样，默默地和那两个殉道者的感情共鸣，防护他们的生命，力争他们的自由，证明他们的无罪，辩护他们的信仰。

而且中国人素抱“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主义，只要没有人把他自己拉去坐电椅，那么，无论谁坐电椅，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当全世界千万个心痛苦着等候这可怕的悲剧结局”时，（见巴黎“L'oeuvre”报）中国的名流胡适之却在《现代评论》上大说风凉话。幸好胡适之的文章没有译成法文，否则 L'oeuvre 报的编辑会拿他骂美国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五日《革命周报》第三十四、三十五期。署名蒂甘。

资产阶级的话来骂中国的大学教授了：“在那边的人，那些有铁石心肠的人，是不愿意听怜悯和理诘之声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读到《革命》的“萨、凡纪念号”怎能不令我感动呢？

人类这个东西真是可恶，他总是常常把他最爱的人杀掉，而把他最恨的人奉为神圣。过去殉道者的悲剧现在不必说了。然而我们谁也不能忘却的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一点十一分到二十六分的时间中，两个近代的伟大人物在麻沙秋谢州被烧死在电椅上了。这两个伟人便是萨珂与凡宰特。

胡适之在美国住过很久，他总知道美国著名文学家辛克拉(Upton Sinclair)的名字罢。(辛克拉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煤油》(“Oil”)也曾轰动过全世界。)那么，我把辛克拉四年前所写的文章抄一节与他看看：“一年前我曾去拜访世界最优美的精神之一，他现在被囚禁在麻沙秋谢州的查理司登监狱中。他并不因为我不曾和他在一起被囚禁而责备我；他以他的精神的优美和温柔，使我觉得自己羞愧异常，不久我自己也盼望去坐监狱了。……这个麻沙秋谢州的伟人是谁呢？他的自叙传刚出版，正放在我的案头。这叫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著者是巴尔托罗美·凡宰特”。纽约《世界报》的主笔布龙(Heywood Brown)也说凡宰特是近代罕见的大人物。至于萨珂呢，甚至麻沙秋谢州州长弗勒的周围的人也赞美他。然而胡适之却是“站在刽子手的一边”而“反对殉道者”的。他捏造事实，颠倒是非，而且还替州长辩护。当他说下而

的话时，我不知道他心理是怎样的：“邦长本可以特赦或减刑的，但美国与世界的无政府党人做出了种种示威运动，……这种暴动不能救他们的命，反激怒了一般公民的心理，因为暴力若能影响司法，司法制度就根本不能成立了。”我反对法律这种东西，然而据胡适之的话看来，我懂得法律的程度还比胡先生深一点。照美国的法律，州长是有权力来减刑的。司法制度之能否成立，我且不管，但法官之受贿，审判之不公平，这却是激起暴动的唯一原因。假若故加人罪，枉法杀人，便能保障司法制度，便能维持司法的尊严，那么，你要杀人就杀好了，何必又借“暴力影响司法”的话来做口实呢？胡先生假若肯费一点时间把萨、凡案件的始末研究一下，他便知道那几个法庭方面的证人在法庭上是怎样说的了。攻击萨珂的共有五个证人：三个女的，二个男的，其中有一个是患神经昏乱症的（Mary Splaine），一个是娼妓（Lola Andrewo），一个是窃贼（Carlos Goodridge），还有两个是谎言者（Frances Deslin, Lonis Pelzer）。他们的供词是互相冲突的，而且在法庭说的和在外面说的又自相矛盾。一个人在一秒半钟内在高处可以把二十五米以外的人的相貌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连那个人有一百四十磅到一百四十五磅的重量也看出来了。这是Mary Splaine的供词，胡先生能相信么？然而根据了这样的供词，法官便判决了萨珂的死刑。虽然有三十二个人到庭证明萨珂的无罪，但裁判官赛叶说他们意大利人的话是不可靠的。同样，有三个证人（Dolbeare, Reed, Vangie 都是说谎者）证明凡宰特有罪，三十一个证人证明他无罪。但法官听了三个说谎者的

互相冲突的证人的话，就判决了凡宰特的死刑。司法制度要靠那些说谎者、窃贼、娼妓、患精神病者来维持，可见它早已倒塌了。假若对于这种制度还不反抗，那个人就无良心，就是禽兽，因为他连一点人的感觉也没有了。胡先生呢，我不敢说他是禽兽，但是他见着不义的罪恶行为，既不反抗，见着好人无罪而被处刑，又不援救，并且在殉道者被害后还作文来侮辱他们，这样我们能说他有一点人的感觉，有一点正义的感觉么？“对于你，我便要代你要求全世界良心尚未丧尽，还知道善恶的人来饶恕你了。”(La Presse) 呜呼！资产阶级的学者！

这几月来，我研究萨、凡的案件，常常自问：州长弗勒、裁判员赛叶，以及罗威尔等究竟是怎样的一类东西，现在胡先生的文章已给了我一个完满的答复：“他们就是胡适之这一类的东西呵！”胡先生要说什么司法制度，那么我们便来谈谈这事件的法律的一方面罢。赛叶自己承认被告方面的证人多过于法庭方面的证人，他又明白萨、凡两人的 Alibis 是不能推翻的，于是他只得发明出新罪名来。法国人权协会总书记 Guernut 在《晚报》上作文说：“新世界发明了一个新的罪名：La conscience de la coupabilité”。这就是赛叶所说 Conscienceness of guilt，这样奇特的罪名不但 Guernut 说法律上没有见过，便是我连翻译也翻译不出来呢！胡先生是要拥护美国司法制度的人，这个新罪名他当然知道的，那么我请他“有以语我”来！

据胡先生及弗勒、罗威尔等说，萨、凡是因谋杀罪而被处死刑的。然而在裁判员向陪审官报告的全案要略里，有十四页

是劝陪审官要像兵士们那样的忠勇，五页是列举责任与良心的事实，只有两页是批驳被告的 Alibis 的，其余的三页尽是夸张的话，与萨、凡并没多大的关系。二十四页的全案要略，便这样的分配了。假若萨、凡是谋杀犯，那么为什么裁判官要提到责任与良心和兵士们的忠勇，更何必提起在法国战场上战死的美国军人呢！

州长弗勒是一个资本家，是一个厂主。他曾叫过，要杀尽无政府党、共产党、I. W. W. 以及一切的革命党（在一九二〇年）。他又在《成功》杂志上发表过《我为什么反对废止死刑》的文章，他曾驱逐过他工厂里罢工的工人，他还希望做美国总统。他是一个胆小的懦夫，他几次想杀萨、凡，然而总不敢下手。所以他延迟了两次萨、凡死刑的执行期，而且一面向萨、凡表示好感，一面又拉罗威尔等来做他的帮手，想把责任放一半在那三个学者的肩上。其实凡宰特也知道弗勒的弱点，他在临死前七十多天寄我的信中还说，“我恐怕他们还不敢烧死我们。”实在，在最后的几天中，弗勒因为接到反对萨、凡死刑的函电太多了，心中很畏惧，不敢毅然决然地拒绝减刑。所以在那几天中这个无能的懦夫心中感到异常的苦闷。最后麻沙秋谢州的美军团(American Legion)来了一份电报叫弗勒不顾民意，拒绝减刑。该团的指挥官J. W. Reth还亲到弗勒的办公室去见他说，美军团以有他这样的州长自豪，他们愿竭尽全力来帮助他。这样弗勒才敢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晚上向萨珂的妻子、凡宰特的妹妹说：“我是依着法律而行的！”

至于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呢，他是弗勒所委任的审查委

员会的委员。然而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一个谋杀犯。哈佛大学毕业生，《三兵士》及其他著名小说的著者 John Dos Passos 在致罗威尔的信中说：“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政治的谋杀犯了。”而且还以一个残酷愚妄的，反对人道与文明的罪恶来玷污了哈佛大学了。而且正如名记者布龙所说，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养成刽子手的地方！为什么我说他是无耻之徒呢？请听我道来：罗威尔在审讯时，因为要推翻萨珂的 Alibis，便说那两个重要的证人 Mr. Bosco 与 Prof Guadagni 是伪证。Bosco 和 Guadagni 证明四月十五日南布朗垂的强盗杀人事件发生时，萨珂在波士顿和他们一起用餐，因为那一天意大利人有一个宴会，所以他们能把这日子记得很清楚。罗威尔坚持地说四月十五日那一天绝对没有意大利人的宴会，这两个人完全在说谎，这两个人和他辩论了许久，举出了许多的证据，他全然不理。第二天早晨，这两个意大利人抱了一本很厚很大的书到州长办公室里来，这是意大利文日报“La Notizia”一九二〇年的合订本。Bosco 还把四月十六日报上关于十五日意大利人宴会的记事译成英文，和原书一起交与罗威尔。罗威尔读完了这记事，立刻站起来走到这两个人面前，和他们握手，要求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发表。他的同事（三个审查委员之一）格兰脱（Grant）还不相信，并且立刻打电话去问 Williams 君（因为那天的宴会是为庆祝他而举行的）。Williams 说这两个人的话是不错的，于是谁是谎言者的问题才解决了。假若这两个人话是不错的，萨珂的 Alibis 是不曾被推翻的，那么，萨珂便与南布朗垂的事件无关，他便是无辜的

而死的。

最后，我引我在《平等》第四期中所说的一段话来作这封信的结尾：

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两个勇敢的同志却昂然地在电椅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死了，死得极勇敢极高贵，他们死得像殉道者，像伟大的英雄。正如法国《自由人》周报所说：他们像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生，又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死！就在电椅上，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表示出来他们是为真理为正义为人类而死。而且他们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向全世界抗议他们是无罪的人！这样他们的一生真算是“完全”的了。在生，他们是生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临死，他们又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难道在那一般困顿床褥，带着可怜和恐怖之色，终日哀号，终日呻吟，一秒一秒钟的，像脱了毛的狗一样的死去的资产阶级之中，我们能找着一个这样的人么？那么，究竟谁胜利了呢？

蒂 甘 11月5日寄自法国。

[安那祺主义文库 编辑出版发行 序言]

自从1989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从日文和英文读到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1992-95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绮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当我得到巴金的译作（人文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10卷电子版）时，读到巴金早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黑色战线”史料，欣喜若狂，这里还有许多是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可悲的是，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无一例外被加上无知、愚昧或无耻的政治按语。更不用说，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祺主义》（1930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书；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

本文库收集的史料，多数来自网上。无论是已经去世的著者、译者和我（编者加少数文章的作者），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所有权”，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

文库大致按国度和时间次序分类。A-美国、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和“安那祺主义”通用。目前收集到以下史料入文库：

A-1：《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万塞蒂与沙珂著，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
A-2：《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2-9
C-1：《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ISBN: 978-0-557-19209-0
F-1：《什么是所有权》，蒲鲁东著，孙馨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R-1：《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6157-7
R-2：《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3-6
R-3：《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6-0
R-4：《俄罗斯革命的起源》，斯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7-7
R-5：《一个革命者的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5-0
R-6：《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巴枯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R-7：《革命的先驱》，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2345-9
S-1：《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收入巴金六篇译文、赵京三篇文章，ISBN: 978-0-557-17055-5

[编者序]

对万塞蒂与沙珂的审判是美国的司法史和安那祺主义运动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他们被处死半个世纪后，1977年8月23日，时任麻省州长的民主党人杜卡基斯签署宣言：“任何耻辱必须永远从沙珂与万塞蒂的名字除去。。今天，我们说：我们在麻省引以为自豪的高度司法公正，对不起沙珂与万塞蒂。”在麻省的州政府大厅，还设置了万塞蒂与沙珂的塑像。这并没有增添万塞蒂与沙珂的光芒，而杜卡基斯倒得到以后竞选美国总统的资本。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定价Price \$12.00

ISBN 978-0-557-16001-3



9 780557 160013